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清华经管学院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同方全球人寿  
Aegon THTF Life Insurance



扫一扫二维码  
关注清华经管学院



扫一扫二维码  
关注同方全球人寿



# 2022中国居民 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CCIRM）成立于2008年4月29日。中心得到了国际著名保险机构苏黎世保险集团的大力支持。

中心使命：建成国际一流的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基地，特别是在保险市场发展和监管研究方面，成为亚洲一流的研究中心。

中心主要目标：不断提高清华经管学院在保险与风险管理方面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加强中国与世界在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成为政府与保险业界有良好声誉并值得信赖的咨询与合作中心。

中心主要工作：定期举办高水平的国际学术活动，不定期举办研讨会；邀请国内外学者来中心进行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承接国家和部委及保险业界的研究课题；与相关的政府部门，保险业界和学术机构开展理论实证研究。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简称同方全球人寿）由荷兰全球人寿保险集团（Aegon）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THTF）各出资50%组建而成，公司于2003年正式获得营业执照，在中国开展寿险业务。公司资产规模超过249亿元，为全国逾百万客户提供周全的保险保障。迄今，公司已在上海、北京、江苏、山东、浙江、广东、天津、青岛、河北、湖北、福建、四川、深圳等省市设立了多家分支机构。同方全球人寿凭借股东百年寿险经验和领先科技能力，致力于帮助客户未雨绸缪，实现财务保障，安享未来。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中国最值得推荐的人寿保险公司。





## 1 摘要

1.1 退休生活愿景：传统观念塑造主流愿景	02
1.2 退休准备指数：2022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为5.70	03
1.3 退休财务规划：退休准备更充足，退休需求多样	03
1.4 专题研究结论	04

## 2 项目背景及概况

2.1 项目背景	06
2.1.1 人口老龄化现状：出生率下降，老年抚养比不断攀升	06
2.1.2 “三支柱”养老金体系：结构失衡，第三支柱亟待发展	09
2.2 项目概况	10
2.2.1 调研方式及内容	10
2.2.2 样本分析	12

## 3 中国居民的退休生活愿景和预期

3.1 退休生活愿景	20
3.1.1 退休年龄预期：年轻人期待早退休，高学历人群偏向晚退休	20
3.1.2 养老方式偏好：家庭养老仍为主流	21
3.1.3 退休生活品质：医疗服务和家人陪伴最受重视	22
3.2 退休生活信心	23
3.2.1 退休生活担忧：身心健康问题易引发困扰	23
3.2.2 退休生活信心：疫情影响信心，对下一代的看法存在分化	24

## 4 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

4.1 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测算	28
4.1.1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计算	28
4.1.2 退休准备指数六个维度的变化	31
4.1.3 国内不同地区退休准备指数的比较	32
4.2 高退休准备指数人群画像	34
4.2.1 个人特征：性别差异基本消除，年长者指数更高	34
4.2.2 家庭特征：已婚且有子女的个人指数更高	36
4.2.3 健康特征：身体与心理健康状况越好，退休准备指数越高	37
4.2.4 教育特征：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指数更高	38
4.2.5 工作特征：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职工指数更高	39
4.2.6 收入特征：个人和家庭收入与退休准备指数正相关	40

## 5 中国居民的退休财务规划

5.1 退休财务准备动机	42
5.1.1 退休规划动机：身体出现衰老征兆是退休规划的最普遍原因	42

5.1.2 激励储蓄方式：减税措施最容易促使人们进行更多储蓄	43
5.2 退休财务准备方式	44
5.2.1 养老金积累方式：希望每月定额储蓄，但实际操作有一定难度	44
5.2.2 养老金收入来源：预期收入主要来自政府，不同职业有所分化	45
5.2.3 具体财务准备方式：金融产品中商业保险更受青睐	46
5.2.4 对财务建议的信任：人们更愿意相信政府和亲属	47
5.3 退休财务准备需求	47
5.3.1 金融产品特色需求：最在意安全性、透明性和流动性	47
5.3.2 财务规划服务需求：希望更全面的养老规划咨询服务	48
5.3.3 健康管理服务需求：认为疾病预防类服务可以改善退休生活品质	48
5.3.4 企业退休服务需求：期待灵活的退休制度安排	49

## 6 专题研究

6.1 中国居民的金融素养	52
6.1.1 居民金融素养客观上存在不足，主要受到教育水平影响	52
6.1.2 居民对自身金融素养的认知不足，存在过度自信现象	55
6.2 中国居民对延迟退休政策的態度	57
6.2.1 居民对于延迟退休政策的支持意愿有待提高	57
6.2.2 工作类型、健康水平等是影响居民延迟退休意愿的主要因素	60
6.3 中国居民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态度	61
6.3.1 居民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缺乏了解，但普遍支持	62
6.3.2 我国居民对于年金产品的需求还有待提升	64
6.4 对青年群体的特别分析	65
6.4.1 青年群体的退休生活预期	65
6.4.2 青年群体对社会生育现状的看法	68
6.4.3 针对青年群体的建议	71
6.5 新冠疫情对居民退休准备的影响	72
6.5.1 总体上疫情降低了居民工作收入，增加了收入波动性	72
6.5.2 多数人选择减少日常开支，并且提前取出退休储蓄	73
6.5.3 总体上对舒适退休生活仍保有信心	74

## 7 结论与建议

7.1 政府可发挥的作用	76
7.2 企业应做出的改善	76
7.3 个人应做出的努力	77
7.4 保险可作为的领域	78

## 8 附录

8.1 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计算方法	79
------------------	----



## 01·摘要

## 01. 摘要

### 1.1 退休生活愿景：传统观念塑造主流愿景

2022 年中国居民的退休生活愿景较为保守，多数居民预期在法定年龄退休，仅有青年群体表现出了提前退休的倾向。出于对家庭观念的重视，我国居民普遍希望居家养老，并且注重家人陪伴。个人的身体健康及其相关财务开支、照料是影响居民退休生活品质和信心的关键因素。具体而言：

- 居民在预期退休年龄方面没有明显偏离法定退休年龄；年轻人表现出了希望提早退休的倾向，同时高学历人士普遍期待更晚退休。
- 家庭养老这一传统养老方式在我国接受度最高，大多数居民仍然期待通过各种形式的居家养老度过退休时光；社会机构、商业机构养老在年轻群体中接受度相对于中年、老年稍有提升。
- 出于对健康的重视，人们最注重的退休生活品质是完善的医疗服务，并且身心健康的问题最易影响退休生活信心；已退休者更加关注家人陪伴，而未退休者则更倾向于为财务问题未雨绸缪。



扫码查看电子版报告



扫码查看报告重点内容摘要

## 1.2 退休准备指数：2022 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为 5.70

2022 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为 5.70。我们使用专家法基于中国的特点重新制定了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六个维度的权重，使用新的权重计算了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我们得到 2022 年高退休准备指数的整体画像：**较为年长、已婚且有子女、身心健康、接受过高等教育、在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高个人收入与家庭收入。**

具体而言：

- 退休准备指数的性别差异基本消除，年长者退休准备指数更高。
- 各省份退休准备指数排名相对 2021 年变化较大，西部地区的退休准备指数排名下降明显，东部地区的退休准备指数排名有所上升。
- 工作特征方面，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职工指数更高，以个人或家庭为工作单位的群体及无工作者退休准备指数较低。收入方面，高个人收入和高家庭收入的群体退休准备指数普遍较高。

## 1.3 退休财务规划：退休准备更充足，退休需求多样

尽管政府依然在人们的退休准备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但人们已逐渐脱离完全靠政府来养老的观念，居民的退休收入责任意识变得更强，自己在退休准备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同时，**居民在养老规划方面的需求也变得更加多样**，不仅仅是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财务收入，还希望获得更高质量的服务。

具体而言：

- 身体出现衰老征兆是居民进行退休规划的最主要原因，减税措施更容易促使居民进行更多储蓄。
- 人们的退休收入主要来自于政府，也更愿意相信来自政府的财务建议。
- 选择退休准备相关的金融产品时，人们的风险偏好普遍较低，更倾向于商业保险产品，并且希望保险公司可以提供与产品配套的养老健康服务。

## 1.4 专题研究结论

专题研究分别从“中国居民的金融素养”、“居民对延迟退休政策的态度”、“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态度”、“对青年群体的特别分析”以及“新冠疫情对居民退休准备的影响”五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得出了以下结论：

- 我国居民金融素养客观上有所不足，欠缺对于风险和收益相关问题理解，主要受到教育水平影响；我国居民对自身金融素养的主观认识存在明显的过度自信现象，老年人、已退休者过度自信程度更强。
- 居民对于延迟退休政策的态度较为保守，对弹性退休政策最为支持；在延迟退休政策的背景下，居民更倾向于增加自身的退休储蓄水平；体制内工作、健康与收入水平较高的居民更支持延迟退休。
- 居民目前对“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还十分缺乏了解，但普遍持有支持态度；居民实际上对个人养老金具有较高的需求，现行缴费上限尚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为了应对长寿风险，应当鼓励居民以年金化方式领取个人养老金。
- 青年群体对预期退休年龄较为乐观，少部分认为自己能够提前退休；青年群体生育意愿低下的原因在于生育成本过高，为了提升生育率，应当为青年群体创造更好的生育福利、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
- 疫情降低了居民的工作收入，增加了收入的波动性；面对冲击，居民优先选择降低日常开支，并可能会提前取出退休储蓄；疫情后居民的退休生活信心略有下降，但对下一代人的退休生活仍充满信心。



## 02. 项目背景及概况

### 2.1 项目背景

#### 2.1.1 人口老龄化现状：出生率下降，老年抚养比不断攀升

我国目前正面临着日渐严重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人口老龄化不仅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也给居民的养老财务准备带来巨大挑战。近年来，**中国社会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例都不断攀升**，如图 2.1 所示。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截至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中国大陆的总人口为 141178 万人，其中 0-14 岁人口为 25338 万人，占 17.95%；15-59 岁人口为 89438 万人，占 63.35%；60 岁及以上人口 26402 万人，占 18.70%，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9064 万人，占 13.50%。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 岁人口的比重上升了 1.35%，15-59 岁人口的比重下降了 6.79%，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 5.44%，而 65 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则上升了 4.63%。

按照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对老龄化程度的界定标准，一个国家 65 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超过 7%，或者 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 10%，即为老年型人口国家。**中国目前的老年人口占比已经达到 14.20%，达到深度老龄化社会标准。**人口老龄化目前在我国的各个省份、地区均十分严重。2020 年，在大陆 31 个省份中，除西藏外，其他 30 个省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均超过 7%，其中 12 个省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 14%。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是目前全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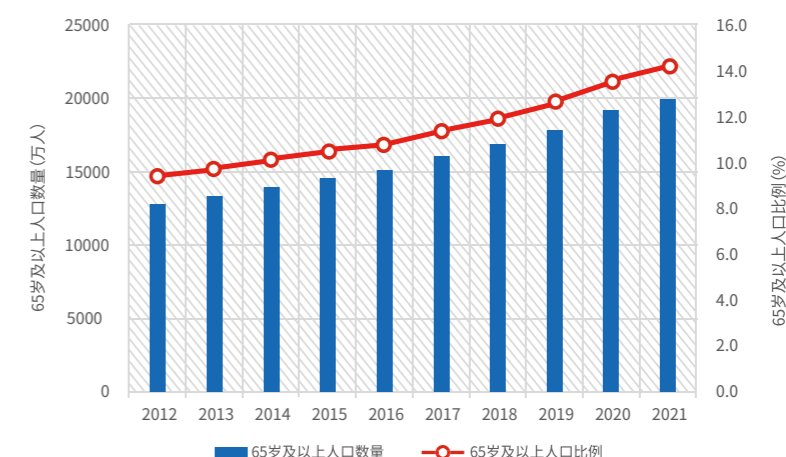


图 2.1 2012-2021 年中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数量与比例

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同时，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却在不断下降，如图 2.2 所示。2021 年，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仅有 0.34‰，人口出生率降至 7.52‰，达到该指标自 1978 年以来的最低纪录。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是持续而深远的，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与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老年抚养比逐年攀升。老年抚养比是指人口中老年人口数（65 岁及以上）与劳动年龄人口数（15-64 岁）的比例，表示每 100 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年人。老年抚养比越高，社会面临的养老保障经济压力越大，年轻人缴纳社会

基本养老保险的税收负担也越严重。2021年，我国社会的老年抚养比已经达到20.8%，表明每名老年人需要约5名劳动人口来进行抚养。倘若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继续下滑，可以预期未来社会面临的养老保障经济压力会持续扩大，年轻人负担加重，当前以现收现付制为主的社保养老基金运营模式恐怕难以为继。

许多学者对于未来基本养老保险存在的潜在收支缺口和发展可持续性进行了研究，结论普遍趋于悲观。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19年发布了《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认为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将在2027年达到峰值，在2035年前后累计结余耗尽。事实上，近年来由于遭受新冠肺炎的冲击，为了缓解企业经营与现金流压力，不少省份实行了减税降费等措施，导致基本养老保险的基金收入大幅下降，在2020年首次出现了收支缺口。在日渐严重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下，未来中国政府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增长压力与财政负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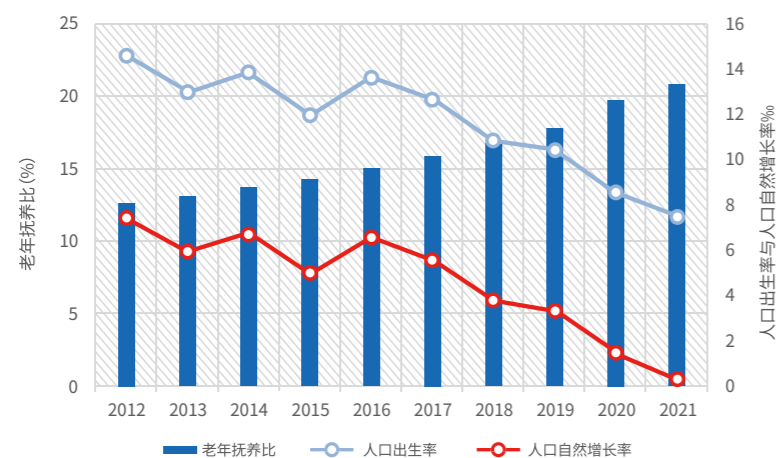


图 2.2 2012-2021 年中国老年抚养比、人口出生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缓解生育率的下降，过去十年中国政府在诸多方面进行了探索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便是生育政策的调整。2013年，中央决定松动已经执行长达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推出了“单独二孩”政策，出生人口在次年得到回升。2016年，为了进一步刺激生育，中央推出“全面二孩”政策，将《人口和计划生育法》修订为“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全面二孩”政策的推出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当年出生人口回升至1800万以上，其中“二孩”占比由2013年的30%左右提升至2017年的50%左右。

然而，随着近年来住房、教育、医疗等生活成本的不断提高，年轻一代晚婚晚育现象严重，二孩政策的刺激效果并没有维持更长的时间，出生人口从2017年开始逐年下降，如图2.3所示。由此可见，开放生育的政策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对缓解生育率下降的效果仍十分有限，尤其是难以提高年轻一代中的一胎生育率，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导致年轻人生育意愿低迷的社会经济问题和生育观念问题。

为了进一步激励生育，表明国家希望改善人口问题的决心，2021年，中央再次推出《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体包括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和住房等支

持政策、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等。然而，由于三孩生育本身必须建立在二孩生育的基础之上，而“二孩政策”有限的实施效果决定了符合三孩生育条件的家庭基数较少，因此，2021年我国的出生人口并没有出现明显回升。不过，通过这些政策，可以看出中央希望激励生育、改善人口问题的决心，若在未来几年内人口出生率能够得到有效改善，可以预期在15-20年内中国老年抚养比上升的趋势可以得到缓解，社会基本养老金的赤字困境也将得到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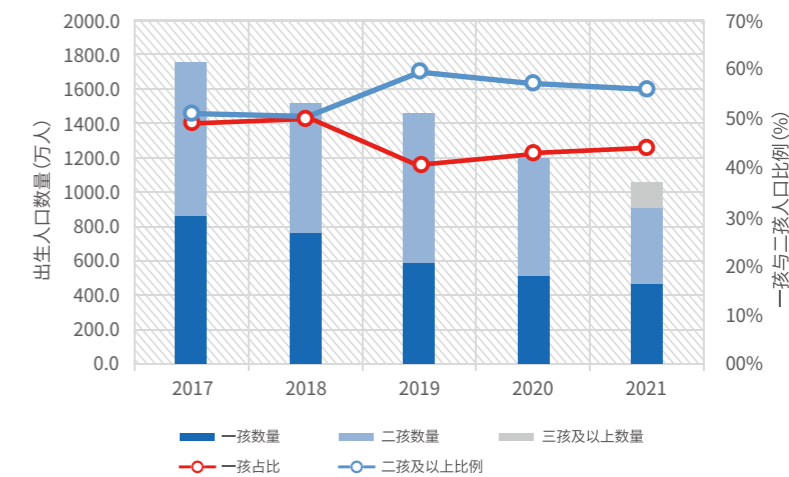


图 2.3 2017-2021 年中国出生人口数量与孩次比例



### 2.1.2 “三支柱”养老金体系：结构失衡，第三支柱亟待发展

上世纪末期，世界银行关注到了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老龄化趋势，对很多国家的退休收入体系和制度改革模式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在 1994 年的报告《应对老龄化危机——保护老年人和促进增长的政策选择》中首次提出了“三支柱”退休收入保障体系，如今也被更多地称为“三支柱”养老金体系，并在全球许多国家开展了实践。在我国，第一支柱是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是指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而第三支柱是指个人养老金，于 2022 年 4 月正式落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要“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肯定了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在中国不断改革、发展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的社会背景下，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促进“三支柱”养老金的协调发展便十分重要。然而，我国养老金第二支柱建立时间较晚、已有政策落实不够到位，第三支柱经过长期探索于今年才正式推出，这导致我国“三支柱”养老金体系目前最大的问题表现为资产结构严重失衡。如图 2.4 所示，在中国的养老金资产规模中，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占据了绝大部分，第二支柱占比相对较小，而第三支柱由于才开始发展，占总资产的比重几乎为零。同样失衡的是“三支柱”养老金的参与人数，2021 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人数已经超过 10 亿人，而第二支柱企业年金的参与人数仅有 2875 万人，不足第一支柱的 3%。因此，绝大多数的中国居民当前仅有第一支柱的退休收入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金累计资产是一个存量的概念，中国当前几乎完全采用现收现付制的方式来运行基本养老保险，每年收缴上来的绝大部分资金都将作为养老金进行发放，因此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资产累计速度较为缓慢。然而，第二支柱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由于开始时间较晚，在近十年间才迅速扩张，当前第二支柱资产规模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缴费导致的现金流入，而养老金给付导致的现金流出很少，因此资产规模在近年来得以迅速扩张，在养老金总资产中的占比提升明显。但实际上，不论是考虑其企业与职工覆盖率还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其规模都仍处在十分低下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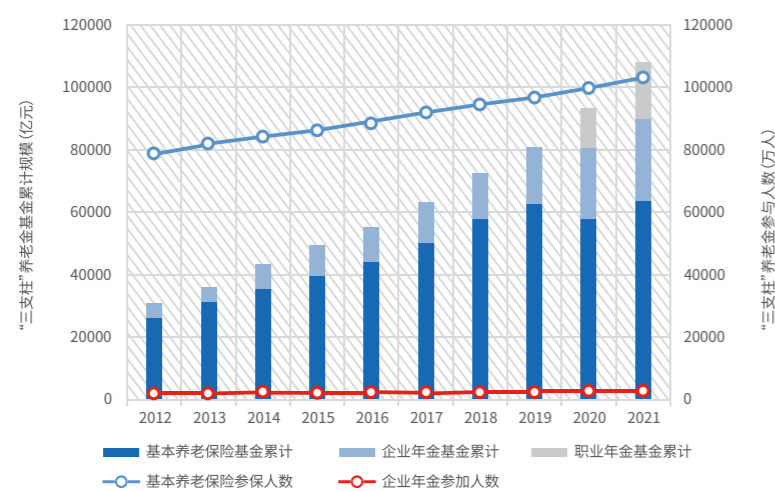


图 2.4 2012-2021 年中国“三支柱”养老金资产规模与参与人数

从绝对数额来看，我国目前的养老金资产积累规模较小，难以满足居民未来的退休生活需求。2021 年末，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6.4 万亿元，第二支柱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基金积累达到 4.4 万亿元，二者加和共占当年 GDP 的 9.4%，而同期以第二支柱为主的美国，其第二、三支柱养老金资产占当年 GDP 的比重超过 150%，在稳定增长的同时能够为居民提供很高的养老保障水平。相比之下，我国由于第二、三支柱发展还很不充分、积累的资产较少，“三支柱”养老金体系的总资产规模较小，导致居民的养老保障水平有限，退休收入替代率很低。

从社会总体层面来看，以养老保障水平更高的城镇职工为例，2021 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 10.7 万元，而 2021 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共支出 5.6 万亿元，有 1.3 亿离退休职工实际领取了养老金，平均每人在当年能够领取 4.3 万元，收入替代率仅有 40.2%，这对于中低收入群体来说属于很低的水平，仅能满足基本的生活开支。此外，由于保障个人权益性并不是公共养老金的原则，政府可能根据未来人口结构的变化调整给付水平，存在一定的政策风险。因此，仅依靠第一支柱养老金难以实现充分的养老保障，我国的养老金体系建设更需要“三支柱”的协调发展。

2022 年 4 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标志着具有政府税收优惠支持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在国内正式成立。该制度允许参与者建立个人养退休账户，缴费完全由自身承担，实行完全基金积累。账户中的储蓄享受国家制定的税收优惠制度，并且可以在符合规定的金融机构与销售渠道购买养老金融产品。可以预期，个人养老金制度不仅有利于补充对非正规部门人群的养老保障，比如家庭妇女、灵活就业人员等，也能帮助高收入、高净值群体进行更专业、充分的退休准备，在退休后实现更高的养老金替代率水平。因此，发展个人养老金对于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 2.2 项目概况

### 2.2.1 调研方式及内容

为科学、系统地了解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情况，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联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从 2013 年起启动了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项目，并连续九年发布了《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目的是：针对中国居民在退休准备方面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为政府制定和完善相应的养老保险制度和政策，企业了解员工的退休生活需求并据此制定和完善员工福利计划，个人制定和完善科学合理的退休养老计划，提供参考。

2022 年度为“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项目持续的第十年。本次调研仍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与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在往年的“全球退休准备指数调研问卷”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居民养老准备的现实情况和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热点问题进行了修订，形成了既能体现当前中国居民退休准备特色、又能与往年调研成果进行纵向比较的“2022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问卷”。

调研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由瀚一数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将问卷植入调查系统，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调研家社区”呈现给受访者，由受访者在线独立填写，每位受访者填



写完后可以获得 4 元的现金回报。问卷发放及回收的时间为 2022 年 8 月 15 日至 9 月 23 日，共回收有效问卷 4026 份，覆盖中国大陆 31 个省份及地区，包括 3624 名在职职工（占比 90%）和 402 名退休居民（占比 10%）。本次调研的内容主要包含四个部分：

(1) 中国居民的退休生活愿景，包括：预期退休年龄、养老方式偏好、对退休生活品质的追求及担忧、对退休生活的信心等；

(2) 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包括：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财务问题理解能力、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等；

(3) 中国居民的退休财务规划，包括：退休规划动机、激励储蓄的方式、养老金的积累方式与预期收入来源、具体的财务准备方式、对财务建议的信任程度、对养老咨询服务及金融产品的特色需求等；

(4) 专题研究，包括：金融素养、对延迟退休政策的态、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态度、针对青年群体的特别分析以及新冠疫情对居民退休准备的影响。

根据调研所得出的结论，报告将从政府可发挥的作用、企业应做出的改善、个人应付出的努力及保险可作为的领域四个方面，为改善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状况提出建议。



### 2.2.2 样本分析

本次调研得到了 4026 个有效样本，样本的基本统计情况与代表性分析如下：

(1) 受访者回答问卷的平均时长为 25.4 分钟，其中最短用时为 7 分钟，总体上受访者的答题过程经过了一定时长的阅读与思考，回答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2) 受访者的年龄与性别分布均衡，各年龄段受访者比例均为 20% 左右，26-35 岁受访者占比最多，符合本次调研着重关注青年群体的调研目标；总体上男女占比相等，25 岁以下的青年群体中女性占比更多，而 55 岁以上的老年群体中男性占比更多；见图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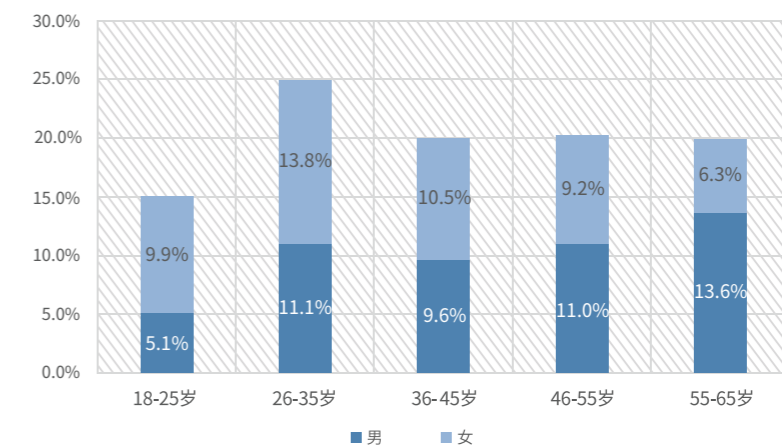


图 2.5 受访者年龄与性别分布

(3) 受访者的学历背景以高中和大学本科为主，二者占比超过 70%；初中及以下、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受访者都占比较少，说明大部分受访者都具有中等文化水平；见图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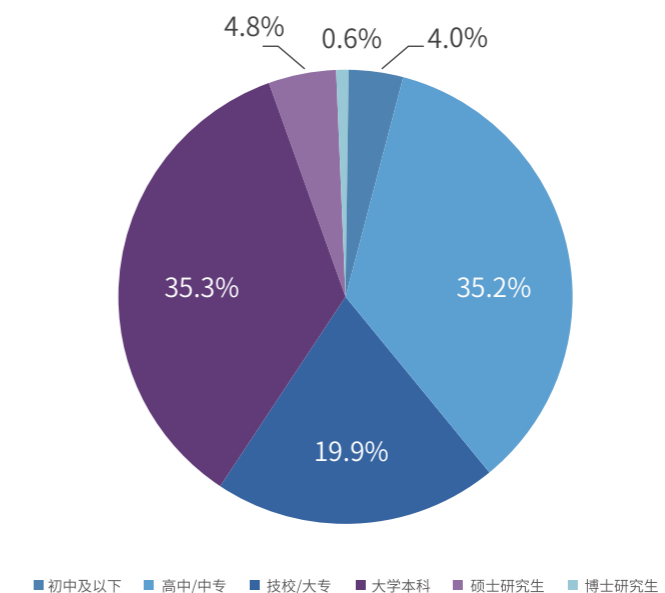


图 2.6 受访者学历背景分布

(4) 受访者的婚姻状况以已婚为主，占比接近 70%；离婚、丧偶的受访者占比极少，说明大部分受访者都具有相对稳定的家庭环境；见图 2.7。

(5) 受访者的受雇单位以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以及私营企业为主，总共占比超过 80%；不论是在职职工还是退休职工，私营企业工作者都占比最大；见图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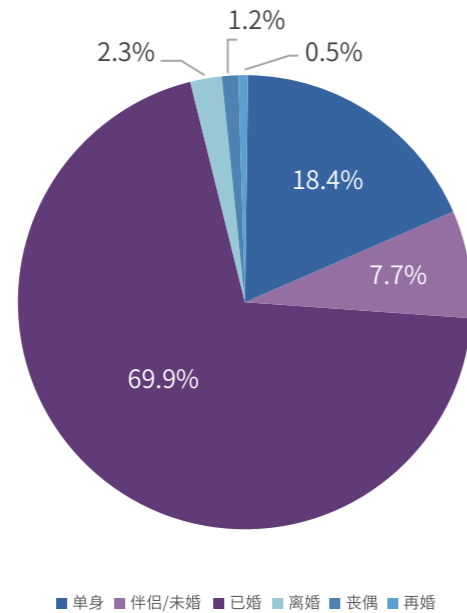


图 2.7 受访者婚姻状况分布

(6) 受访者的自评健康水平分为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两个维度，对自我的评价都以“比较好”和“一般”为主；受访者对自身心理健康的评价高于身体健康，说明受访者总体在心态上更为积极乐观；见图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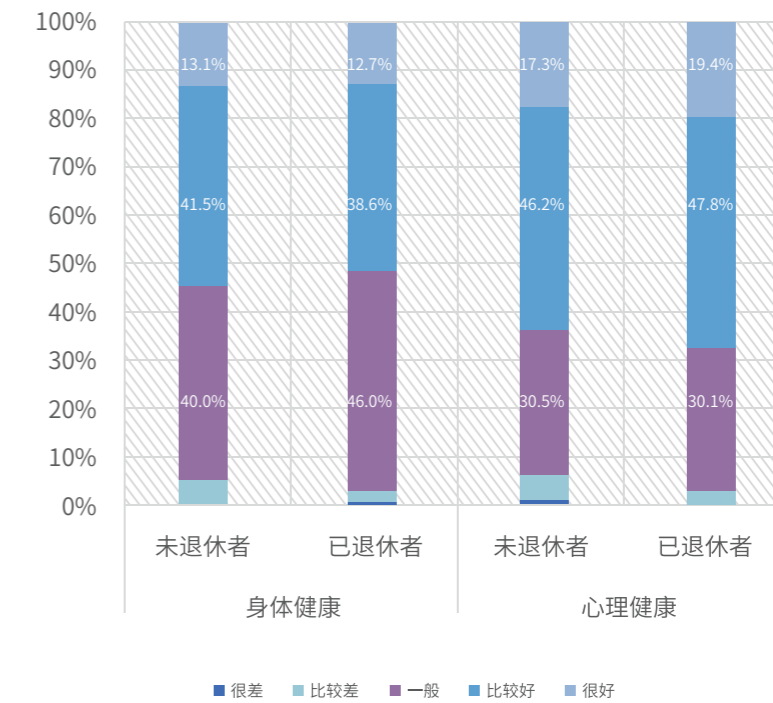


图 2.9 受访者自评健康水平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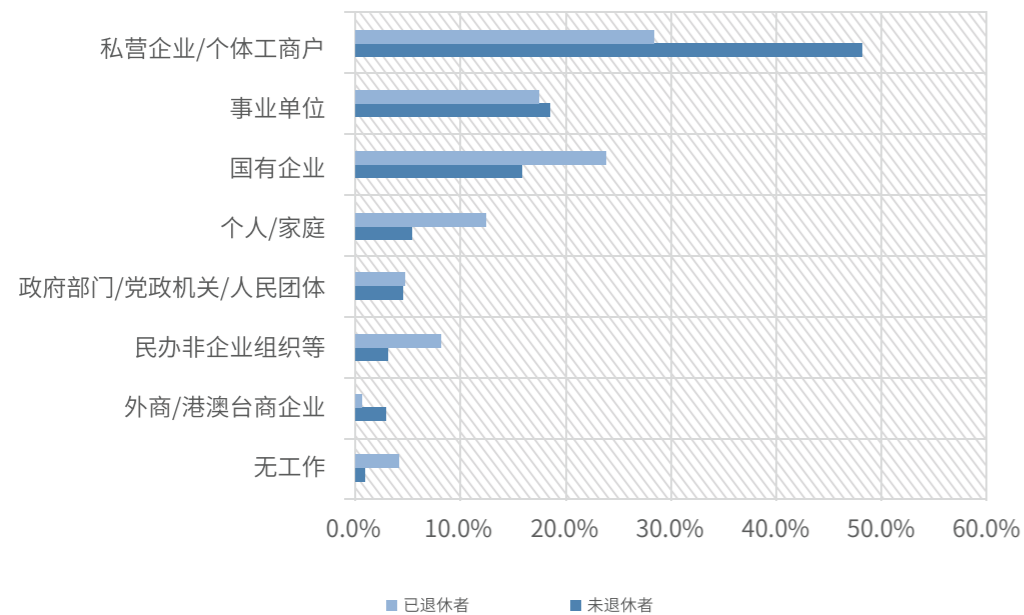


图 2.8 受访者受雇单位分布



(7) 受访者来自全国 31 个省、市和自治区，其中受访者数量最多的地区为江苏、浙江、广东和山东；见图 2.10。

(8) 受访者的个人税前年收入的均值为 9.2 万元，中位数为 8 万元，最大值为 180 万元，最小值则不到 1 万元；从分布来看，75.6% 的受访者个人税前年收入不超过 10 万元，仅有 4.3% 的受访者个人收入高于 20 万元；受访者的家庭税前年收入的均值为 19.5 万元，中位数为 15 万元，最大值为 400 万元，最小值为 1 万元；其中，71.4% 的受访者家庭税前年收入不超过 20 万元，仅有 2.9% 的受访者家庭收入高于 50 万元；见图 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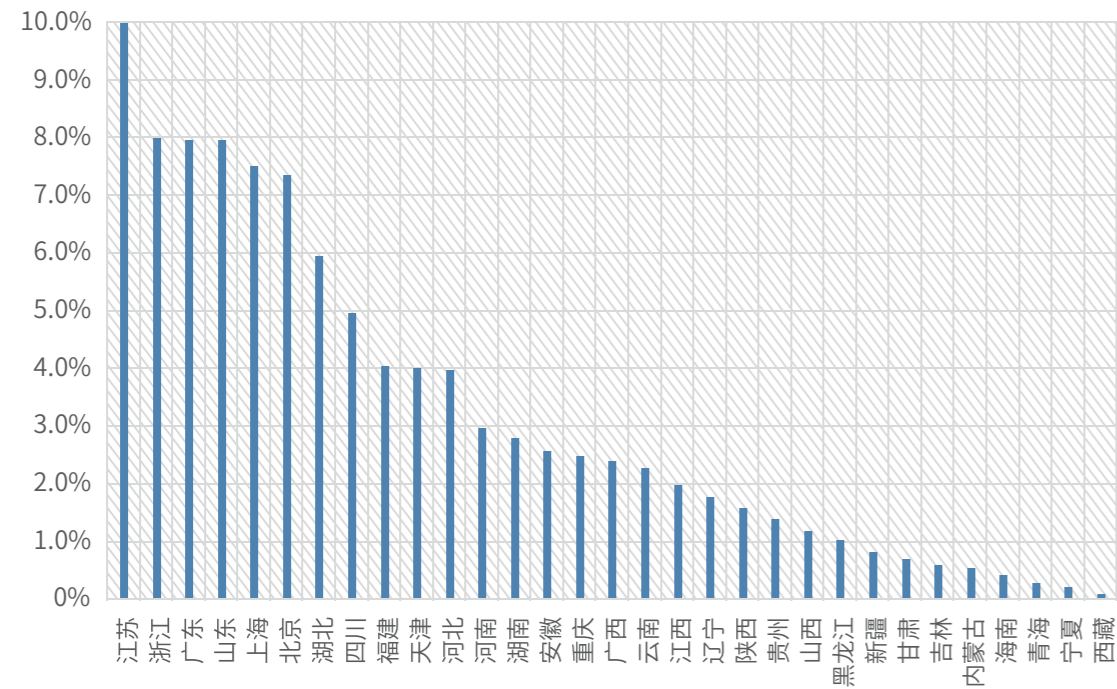


图 2.10 受访者地域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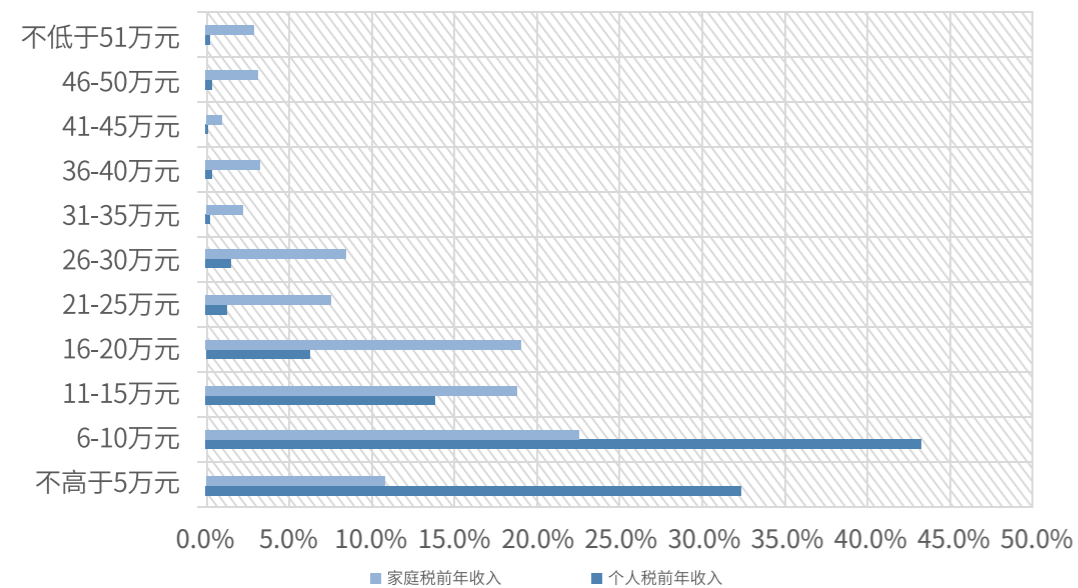


图 2.11 受访者收入水平分布

(9) 受访者的家庭资产总额（包括固定资产与流动资产）普遍低于 300 万元，仅有 15.4% 的受访者家庭资产高于 300 万元；受访者的家庭金融资产总额（包括现金及存款、银行理财产品、股票、基金、债券、保险等）则普遍低于 50 万元；见图 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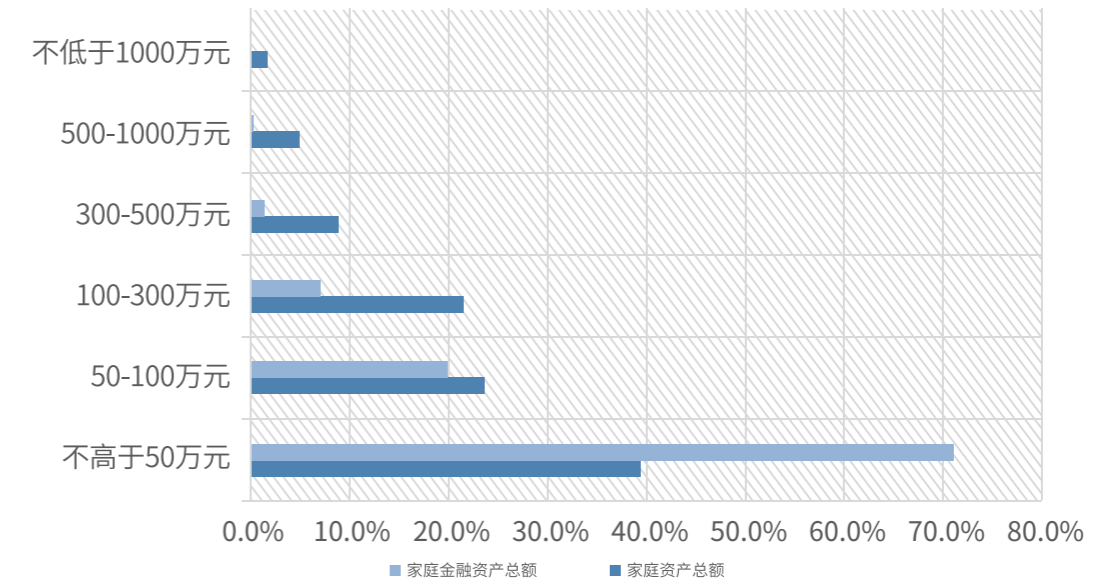


图 2.12 受访者资产水平分布



(10) 受访者具体的描述性统计信息见图 13、图 14。

为了解本次调研的受访者是否具有代表性，将受访者统计数据与全国人口及往年调研的相关数据分布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样本在年龄结构、受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方面优于全国整体水平。具体而言，本次调研的受访者在年龄结构上更加年轻化，在地域上更多集中于发达省市，家庭收入水平更高，且普遍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因此，本次调研的结论对于了解具有小康生活水准的城镇居民的退休准备更具有参考意义。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本次调研样本的收入与受教育水平总体上低于往年项目调研样本。以收入水平为例，本次调研受访者个人税前年收入的均值为 9.2 万元，与全国城镇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相近，却仅达到 2021 年受访者收入均值的约 50%。因此，在对调研数据进行纵向比较时，应当充分考虑样本的代表性差异。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占比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占比
年龄	4026	100.0%	受雇单位	4026	100.0%
18-25岁	603	15.0%	政府部门/党政机关	185	4.6%
26-35岁	1002	24.9%	事业单位	744	18.5%
36-45岁	810	20.1%	国有企业	670	16.6%
46-55岁	811	20.1%	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	1862	46.2%
55-65岁	800	19.9%	外商/港澳台商企业	112	2.8%
性别	4026	100.0%	民办非企业组织	150	3.7%
男	2026	50.3%	个人/家庭	248	6.2%
女	2000	49.7%	无工作	55	1.4%
学历水平	4026	100.0%	婚姻状况	4026	100.0%
初中及以下	163	4.0%	单身	742	18.4%
高中/中专	1416	35.2%	伴侣关系/未婚	308	7.7%
职业技术学校/大专	803	19.9%	已婚	2816	69.9%
大学本科	1423	35.3%	离婚	93	2.3%
硕士研究生	195	4.8%	丧偶	47	1.2%
博士研究生	26	0.6%	再婚	20	0.5%
自评身体健康水平	4026	100.0%	自评心理健康水平	4026	100.0%
很差	13	0.3%	很差	33	0.8%
比较	195	4.8%	比较	198	4.9%
一般	1635	40.6%	一般	1225	30.4%
比较好	1659	41.2%	比较好	1866	46.3%
很好	262	6.5%	很好	704	17.5%

图 2.13 受访者描述性统计 (1)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占比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占比
个人税前年收入	4026	100.0%	家庭税前年收入	4026	100.0%
不高于5万元	1300	32.3%	不高于5万元	437	10.9%
6-10万元	1743	43.3%	6-10万元	911	22.6%
11-15万元	558	13.9%	11-15万元	757	18.8%
16-20万元	252	6.3%	16-20万元	768	19.1%
21-25万元	54	1.3%	21-25万元	307	7.6%
26-30万元	63	1.6%	26-30万元	344	8.5%
31-35万元	12	0.3%	31-35万元	89	2.2%
36-40万元	13	0.3%	36-40万元	130	3.2%
41-45万元	4	0.1%	41-45万元	36	0.9%
46-50万元	15	0.4%	46-50万元	129	3.2%
不低于51万元	12	0.3%	不低于51万元	118	2.9%
家庭资产总额	4026	100.0%	家庭金融资产总额	4026	100.0%
不高于50万元	1586	39.4%	不高于50万元	2860	71.0%
50-100万元	953	23.7%	50-100万元	803	19.9%
100-300万元	866	21.5%	100-300万元	282	7.0%
300-500万元	355	8.8%	300-500万元	60	1.5%
500-1000万元	196	4.9%	500-1000万元	13	0.3%
不低于1000万元	70	1.7%	不低于1000万元	8	0.2%

图 2.14 受访者描述性统计 (2)



## 03. 中国居民的退休生活愿景

### 3.1 退休生活愿景

#### 3.1.1 退休年龄预期：年轻人期待早退休，高学历人群偏向晚退休

本次调研中，**未退休受访者的平均预期退休年龄为 58.6 岁**。将受访者按照年龄划分，可以发现除了 56 岁以上的受访者外，其余各年龄组的预期退休年龄均稳定在 57-58 岁。

在各年龄组当中，年龄越小的年龄组的平均预期退休年龄越小，说明**年轻人普遍希望较早退休**。其中，18-25 岁男性受访者的平均预期退休年龄是 59.7 岁，这一水平略低于我国男性居民的法定退休年龄，说明有不少青年男性受访者具有提前退休的预期。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我国的延迟退休政策很有可能在未来落地。在《“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当中提到，我国将会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促进人力资源充分利用。青年群体当前的退休预期和未来的延迟退休趋势尚未完全匹配。因此，居民对于退休年龄的预期仍需进一步调整，未来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行需要循序渐进。

56 岁及以上的受访者普遍预期自己将在 65 岁左右退休，这一预期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组。对于这一结果，一方面可能因为高龄未退休受访者对于退休政策更加了解和关注，从而对延迟退休政策有了更加理性的预期；另一方面，也可能说明高龄未退休者有较强的工作意愿、工作能力、工作信心和继续工作以实现退休储蓄的需求，导致他们预期自己较晚退休。这一组受访者的平均预期退休年龄说明**即使拥有较高的工作意愿和持续工作的能力，人们对退休年龄的预期也很难超过 65 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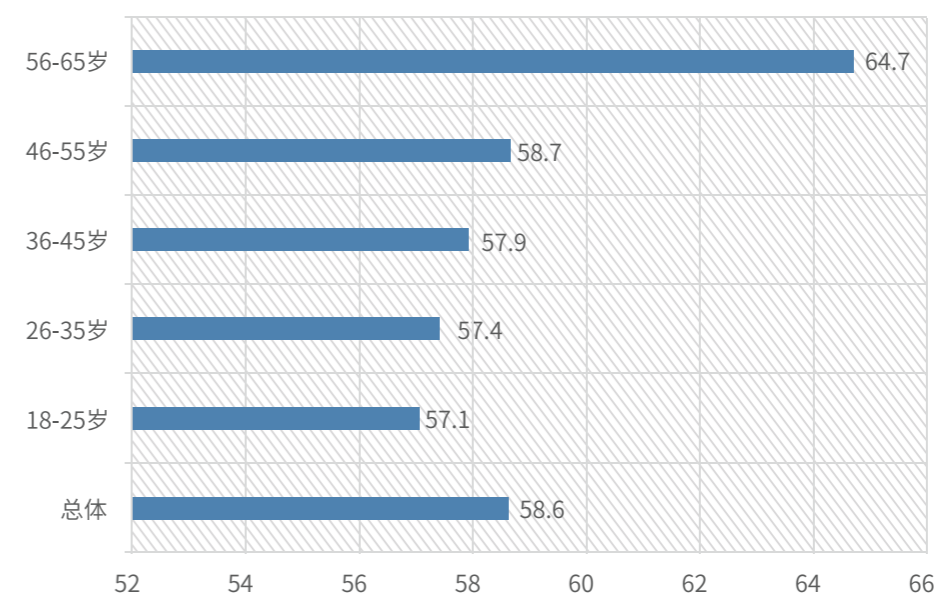


图 3.1 不同年龄段受访者的平均预期退休年龄

不同学历水平的受访者的平均预期退休年龄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在职业技术学校、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这四个群体当中，**学历越高的受访者普遍预期自己更晚退休**。其中，学历为硕士研究生的受访者平均预期退休年龄为 58.8 岁，这一水平与全国平均较为接近。相比之下，学历为大学本科与职业学校或大专两组受访者平均预期退休年龄分别只有 57.2 岁、57.6 岁，而博士研究生的退休年龄预期高达 60.9 岁。从这一结果可以看出高学历人群更愿意延迟自己的退休。高学历人群愿意运用自己的学识在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这对于社会来说是积极的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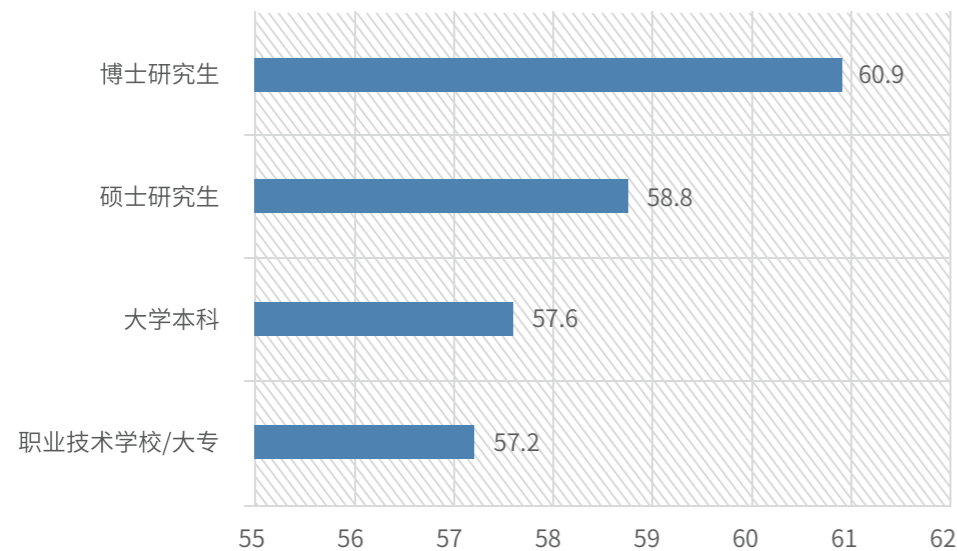


图 3.2 不同学历水平受访者的平均预期退休年龄

### 3.1.2 养老方式偏好：家庭养老仍为主流

居民对于养老方式的偏好是其退休愿景中的重要部分，基于不同的养老方式偏好，人们会做出相应的退休准备。通过了解人们希望以何种方式度过自己的退休生活，政府与企业能够提供使居民更加合意的服务。

在本次调研中，我们为受访者提供了社区居家养老、传统家庭养老、家庭护理养老、社会机构养老、商业机构养老五个选项，询问其对于养老方式的偏好。结果显示，有 47% 的受访者希望通过传统居家养老的方式安享晚年，并且**传统居家养老在各年龄段受访者当中都是第一选择**。中国居民的另一主流养老选择是社区居家养老，在本次调研中得到了 28% 受访者的青睐，还有 11% 的受访者选择了家庭护理养老，总计 86% 的中国居民希望在家庭这一社会单位中进行养老，可见中国居民较强的家庭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养老方式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养老的不同方式（社区居家养老、传统家庭养老、家庭护理养老）在不同年龄段中的受欢迎程度略有不同。36 岁以上受访者当中，**年龄段越大的受访者越偏好通过传统家庭养老，说明高龄居民更加依赖和信任家人子女的照顾**。社区居家养老在 26 岁 -35 岁、36 岁 -45 岁两个年龄段的受访者当中较为受欢迎，分别得到了 32%、33% 的选择。说明我国青年、中年居民对政府和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有更高的接受度。

社会机构养老、商业机构养老两种新兴养老方式在我国尚未成为主流。但随着受访者年龄段的降低，受访者选择这两种养老方式的比例也在提高，说明**在更年轻代际的群体中，在家庭之外的场所养老这一观念的接受度有所提高**。相比于商业机构，26 岁以上的受访者普遍更加信任社会机构养老，只有 18-25 岁这一最年轻的受访者群体当中，商业机构得到了更多人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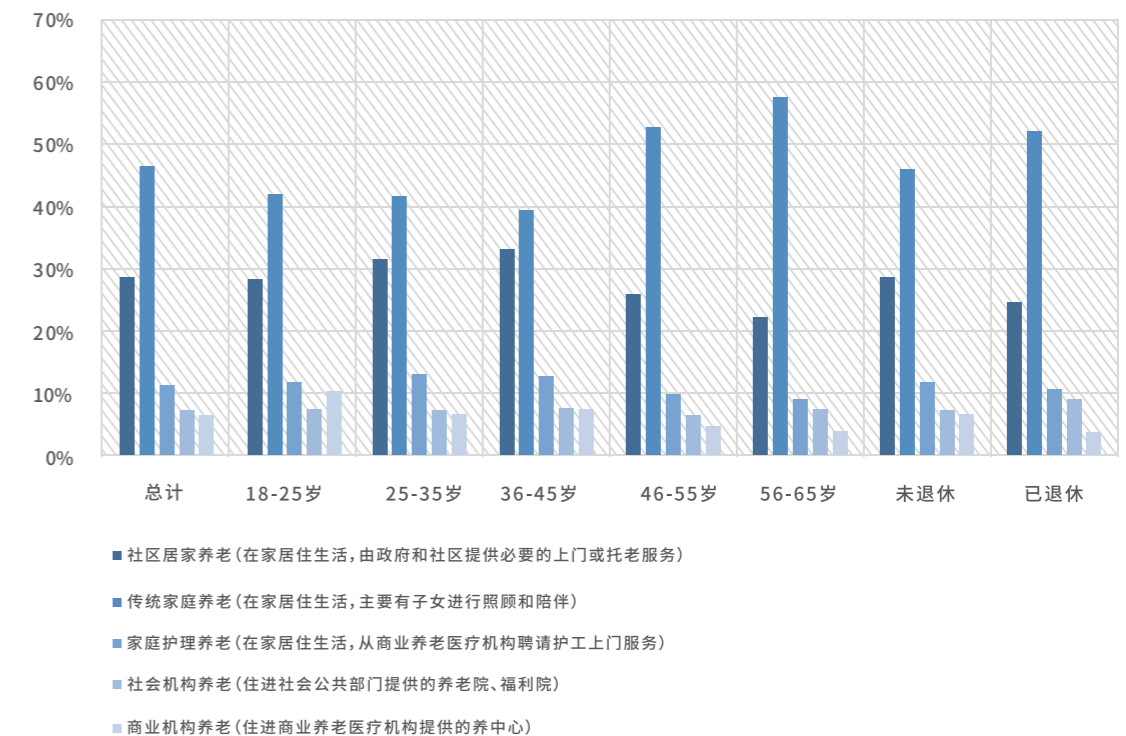


图 3.3 受访者对于不同养老方式的偏好

### 3.1.3 退休生活品质：医疗服务和家人陪伴最受重视

为了直观地了解我国居民退休愿景，我们调研了受访者最看重的退休生活品质，问卷选项中既包括继续工作学习、旅行等退休后可以从事的活动，也包含如自然环境、资金保障等与退休生活质量相关的客观物质条件。

**70% 的受访者选择完善的医疗服务作为他们注重的退休生活品质，这使其成为调研中最受关注的退休生活品质**。紧随其后的是良好的居住和服务设施、能够与家人生活在一起这个两因素，二者都获得了 56% 受访者选择。相比之下，受访者对于学习、旅行、社交等退休后能够充实生活的活动重视程度相对较低。上述结果说明，对于中国居民来说，影响退休生活品质的最大因素是退休后生活中医疗、居住等基础性需求是否能够得到满足和保障。

出于对家人的信任、较强的家庭观念以及对于家人陪伴的心理需求等可能的原因，高达 49% 的受访者认为能够与家人生活在一起十分重要。**已退休者格外关注能否与家人共同生活**，有 56% 的已退休受访者选择了此项品质，远高于未退休者当中 49% 的比例。此外，已退休者也比未退休者更加希望自己退休后能够享受到良好的自然环境。

未退休者更加关注自己退休时能否拥有充足的资金保障，有 35% 的未退休者将其选为自己最为注重的退休生活品质，相比之下，已退休者关注这一因素的比例只有 22%。由于未退休者仍处于通过劳动获取工资收入的人生阶段，他们需要对自己的收入进行分配，并考虑为自身退休进行储蓄，这种财务规划意识和理财需求可能引发了他们对退休后的资金保障的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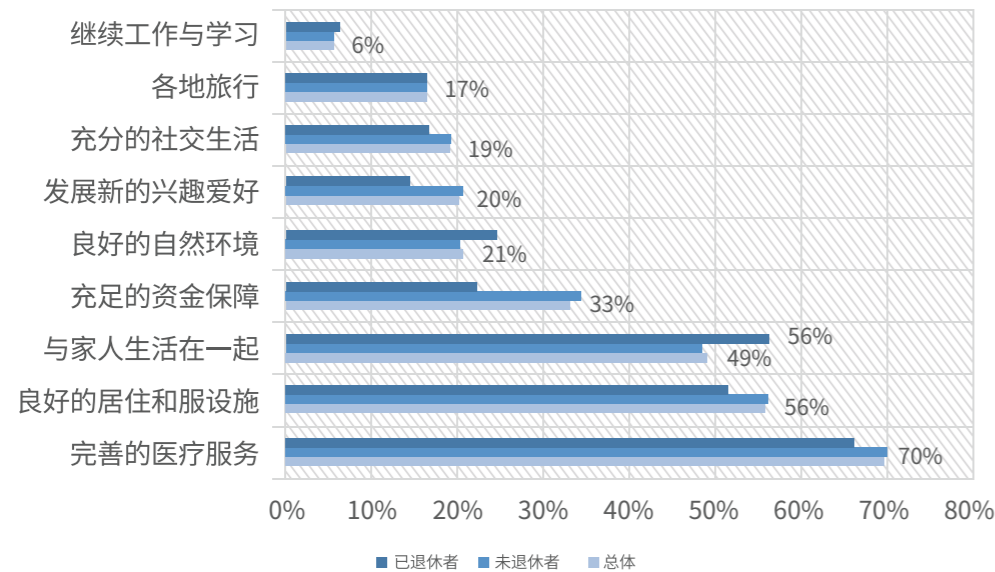


图 3.4 受访者最为看重的养老生活品质

## 3.2 退休生活信心

### 3.2.1 退休生活担忧：身心健康问题易引发困扰

居民的退休信心水平受到诸多因素影响。随着年龄增长，居民可能受到身体健康状况下滑、生活状态改变等方面的困扰，进而产生对于退休生活的担忧。通过调研居民对于退休生活担忧的来源，我们可以分析居民退休信心对于哪些因素较为敏感。

在问卷中列出的众多选项中，**最让居民担忧的困扰普遍来自于身体健康方面**。有 59% 的受访者对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表示担忧，还有 54% 的受访者表示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每况愈下。同时，人们也十分担心自己退休后无法负担医疗费用。这一结果说明，如果社会机构、商业机构能够为居民提供完善而又可负担医疗、体检、康复、护理等健康相关服务，将有效提高居民对退休生活的信心水平。

**相比于已退休居民，未退休居民更容易为退休后的开支感到担忧**。有 23% 的未退休受访者担心自己在退休后陷入无力支付医疗和护理费用的困境，未退休者为这两个选项感到担忧的比例均明显高于已退休者。这一结果再次印证了未退休者比已退休者更加关注退休后的财务问题。

**已退休居民对于缺乏陪伴和社交的担忧程度高于未退休居民**。“缺乏子女陪伴、亲人团聚机会减少”以及“生活孤独、社交减少”是已退休者除了身体健康相关因素外最为担忧的选项。同时，为这两个选项担忧的未退休者比例明显较低，说明退休后可能遭遇的孤独、缺乏陪伴等社交困难以及心理健康问题往往被未退休者忽视。作为已经体验了退休生活的人群，已退休者对于退休生活的困扰和担忧往往来自自己的真实经历和切身感受，也更具有参考意义。上述结果说明，居民退休后的陪伴和社交等需求应被广泛关注和满足，值得未退休者在进行退休准备和规划时加以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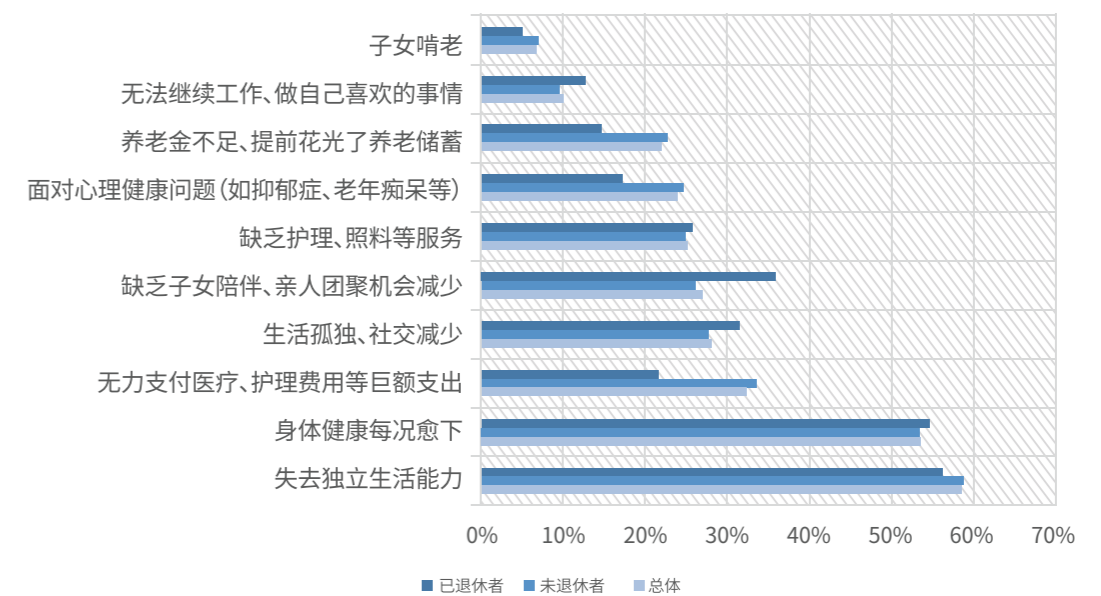


图 3.5 受访者对于退休生活的担忧因素

### 3.2.2 退休生活信心：疫情影响信心，对下一代的看法存在分化

本次调研中，我们也设置了更加直接的问题来询问受访者对于退休后过上舒适生活的信心程度，以便更加直观地了解受访者对于退休生活的主观信心水平。结果显示，有 7% 的受访者选择了完全有信心过上舒适的退休生活，也有 34% 的受访者认为比较有信心；大多数受访者给出了较为中性的回答，只有 17% 受访者对自己的退休生活前景感到悲观。**总体来说，我国居民的退休生活信心水平较强。**

**我国居民对于自己下一代人的退休前景的看法更加分化**。我们向受访者询问他们对于自己下一代人过上舒适的退休生活的信心程度，共计有 44% 的受访者选择了比较有信心或完全有信心，这一结果高于对自己的退休生活有信心的受访者比例；同时，有 20% 的受访者对于下一代的退休生活没有信心，这一结果也高于对自己退休生活没有信心的受访者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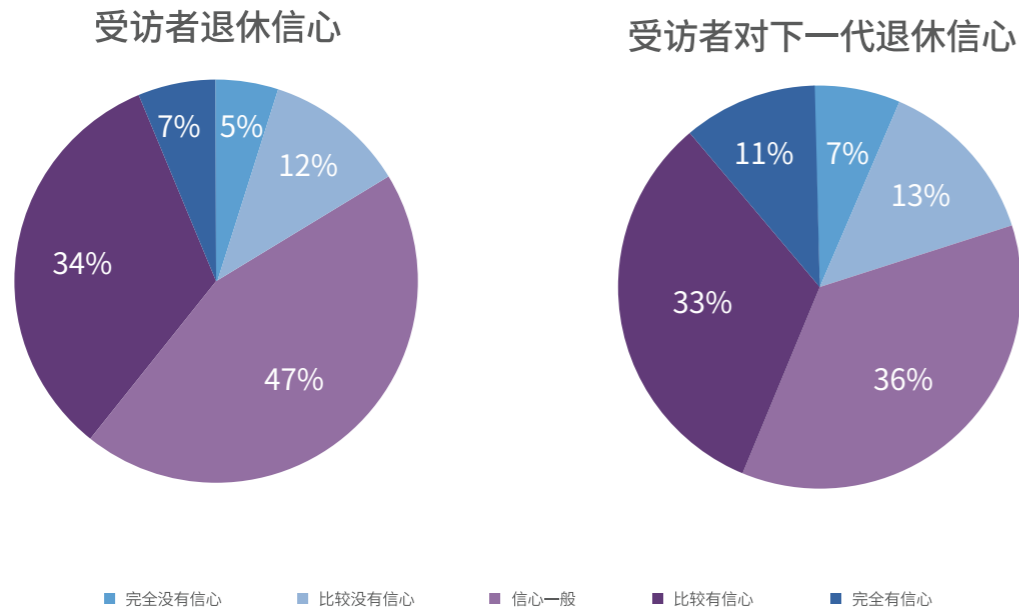


图 3.6 受访者对于自己和下一代人群的退休信心水平

自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许多中国居民的生活工作状态相比于疫情前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调研了疫情对于我国居民的退休信心水平影响。结果显示，**只有少数受访者认为自己在疫情过后有更高的退休生活信心，而有高达 47% 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对退休生活的信心在疫情之后有所降低。**

从年龄结构来看，在疫情之下，青年人、中年人的退休生活信心比老年人的退休生活信心下降更多。调查结果显示，**疫情对于处于 26-35 岁的青年人、36-45 岁年龄段的中年人影响最为明显**，处在这两个年龄段中的受访者有 13% 的比例认为自己的退休信心水平在疫情后有较大的减少。特别是在 26-35 岁年龄段的青年群体当中，认为自己退休生活信心在疫情后有所减少的比例高达 53%。导致这一结果可能的原因是疫情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中青年群体失业率升高，个体收入水平降低、收入的波动性增大，因此可能最终导致退休储蓄不足，从而降低该群体对退休生活的预期。对于上述结果还有一种可能的理解方式，由于年龄段更低的受访者的退休信心实际上是建立在对于更长远未来的预期之上的，所以年轻人的退休生活信心减少更多的结果可能反映了疫情对于人们对更远期的未来的信心有更大冲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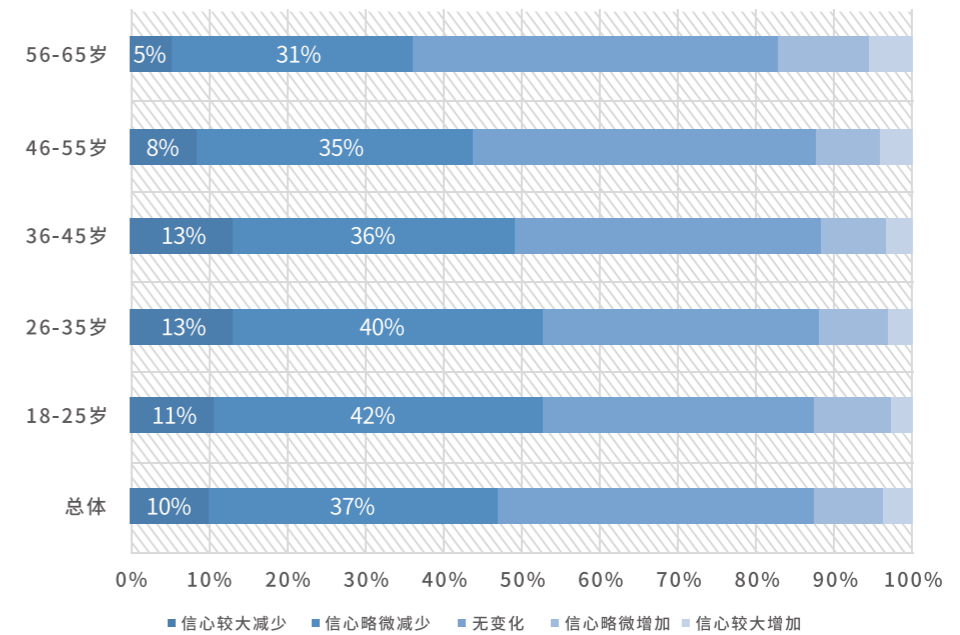


图 3.7 疫情对于各年龄段受访者退休生活信心的影响

疫情对于从事不同职业的居民的退休信心水平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具体而言，**就职于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受访者退休信心受到疫情的影响较小**，仅有 5% 来自事业单位的受访者和 9% 来自国有企业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退休信心在新冠疫情之下有较大的减少，这一比例在各组受访者中最低。相比之下，来自于外资或民营企业的受访者以及个体工商户的退休信心水平下降较为明显。其中，就职于外商或港澳台企业的受访者的退休信心水平下降最为严重，有 17% 的比例选择了信心较大程度下降，同时有 39% 选择了信心略微减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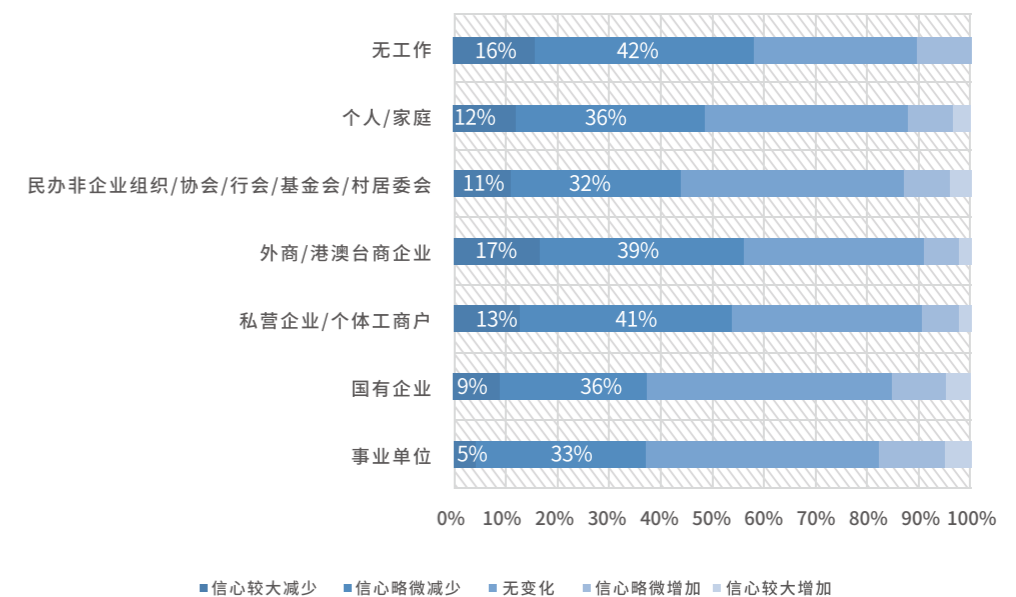


图 3.8 疫情对于不同职业受访者退休生活信心的影响



## 04. 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

### 4.1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测算

为了科学地分析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情况，我们沿用了历年选取的六个维度，采用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财务问题理解能力、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以及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六个指标并分别赋以相应的权重来计算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退休准备指数的取值为 0-10，数值越大意味着退休准备越充分，其中数值 8-10 为高退休准备指数，表明退休准备非常充分；数值 6-8 为中等退休准备指数，表明已经有了一定的退休准备，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数值低于 6 为低退休准备指数，表明退休准备不足，需要引起重视。

#### 4.1.1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计算

为了更贴合中国居民的生活实际，对六个维度的退休准备情况进行更清晰准确的衡量，我们在历年问卷题目基础上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问卷题目如下：

- ①（退休责任意识）您在多大程度上觉得自己应当负责和确保退休后拥有足够的收入？
  - A. 我完全不需要负责
  - B. 我在一定程度上不需要负责
  - C. 我的责任意识一般
  - D. 我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负责
  - E. 我应当完全负责
  
- ②（财务规划认知水平）关于是否需要为退休做好财务规划，您如何评价自己的认知水平？
  - A. 我认为退休财务规划完全不重要
  - B. 我认为退休财务规划不太重要
  - C. 我的认知水平一般
  - D. 我认为退休财务规划比较重要
  - E. 我认为退休财务规划非常重要
  
- ③（财务问题理解能力）对于退休规划中的财务问题，您认为自己的理解能力有多强？
  - A. 我觉得很难理解
  - B. 我觉得比较难理解
  - C. 我的理解能力一般
  - D. 我觉得比较容易理解
  - E. 我觉得十分容易理解
  
- ④（退休计划完善度）回想您本人的退休规划过程，就目前来说，您认为自身的退休计划有多完善？
  - A. 我还完全没有退休规划
  - B. 我的退休规划还不太充分
  - C. 我的退休规划水平一般

## 04· 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

- D. 我的退休规划比较完善
- E. 我的退休规划已经非常完善

- ⑤ (退休储蓄充分度) 考虑您为退休储蓄的资金, 您认为自己的储蓄水平是否充分?
- A. 我的储蓄水平十分不充分, 很难为退休存下钱
  - B. 我的储蓄水平比较不充分
  - C. 我的储蓄水平一般
  - D. 我的储蓄水平比较充分
  - E. 我的储蓄水平十分充分, 已经存够了
- ⑥ (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 您对自己取得期望的退休收入有多大的信心?
- A. 我对自己取得期望的退休收入完全没有信心
  - B. 我对自己取得期望的退休收入比较没有信心
  - C. 我对自己取得期望的退休收入信心一般
  - D. 我对自己取得期望的退休收入比较具有信心
  - E. 我对自己取得期望的退休收入完全具有信心

我们采用专家法, 选取了十二位学界与业界的专家的意见, 重新确定了六个维度的权重。

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财务问题理解能力、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分别对应的权重为 16.25%、18.75%、13.75%、17.50%、22.92%、10.83%。对每一个维度的五个程度选项分别赋值为 0、2.5、5、7.5、10, 数值越大, 代表该维度的退休准备越充分, 加权平均得到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的数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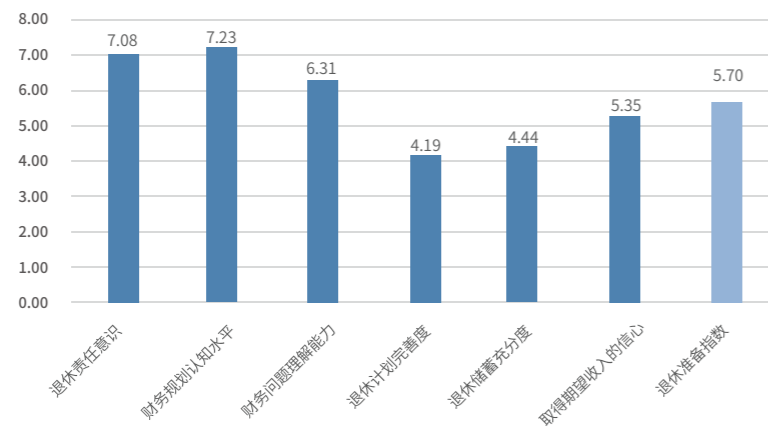


图 4.1 2022 年六个维度及退休准备指数数值

经过计算得到, 2022 年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为 5.70, 使用今年的权重对 2021 年的样本进行计算得到的退休准备指数为 6.87。对比可知 2022 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明显低于 2021 年计算的结果, 其主要原因来源于样本特点的差异: 本次调研样本的收入与受教育水平总体上低于往年项目调研样本, 但更接近中国居民的整体水平。以收入水平为例, 本次调研受访者个人税前年收入的均值为 9.2 万元, 与全国城镇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相近, 却仅达到 2021 年受访者收入均值的约 50%。除此以外, 本次调研针对中国现实我们对问卷的表述和六个维度的

权重进行了调整, 重新制定了更能反映真实退休准备情况的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计算方法。同时我们还对问卷问题进行了优化, 用文字解释了各个选项对应的信心程度, 并且设置了辅助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受访者的过度自信问题。因此在本次调研中信心程度最高的人数比例大幅下降, 但这恰好说明了本次计算的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更能反映出真实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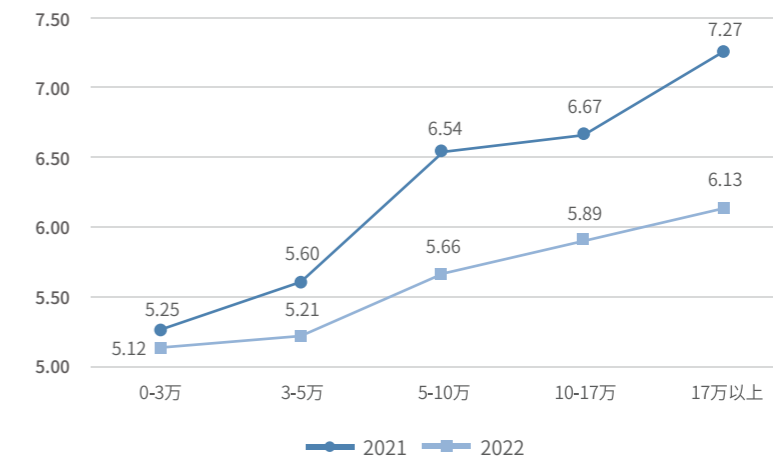


图 4.2 使用旧权重计算的 2021 和 2022 不同个人收入组的指数平均值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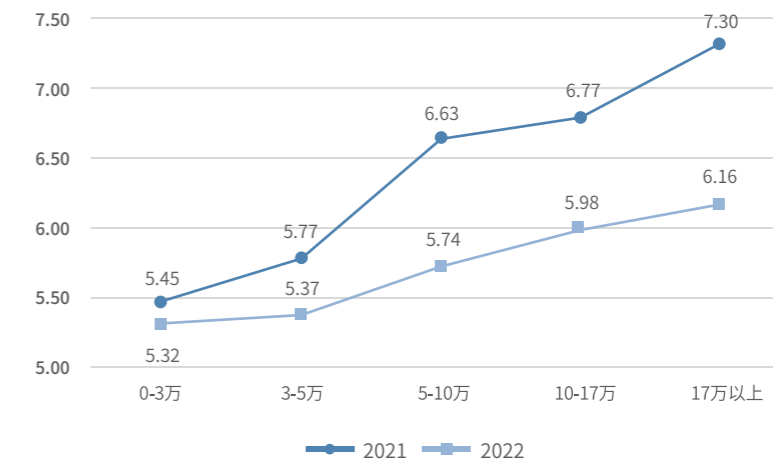


图 4.3 使用新权重计算的 2021 和 2022 不同个人收入组的指数平均值对比

使用 2021 年和 2022 年数据按照个人收入由低到高分 5 组, 分别使用新权重计算不同个人收入组的指数平均值对比如上图。在较低收入的两个组 (年收入 0-3 万和 3-5 万) 当中, 退休准备指数的变化不大, 中高收入组 (年收入 5 万以上) 的退休准备指数下降明显, 证实了上述对受访者群体变化以及过度自信问题的结论。以上结果说明 2022 年较 2021 年退休准备指数整体下降, 且高收入人群退休准备指数下降明显。低、次低、中、次高、高收入人群退休准备指数分别下降 0.13、0.40、0.89、0.79、1.14。

### 4.1.2 退休准备指数六个维度的变化

2022 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的六个构成部分中不同分数段的人数比例相对于 2021 年都有一定程度的变化。其中“退休责任意识”和“财务规划认知水平”的高分段人群比例有小幅度的下降，问卷对程度的细化更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居民在这两方面的实际情况。“财务问题理解能力”和“退休储蓄充分度”的中分段人群比例较高，说明大多数受访者已经具备基本金融素养，并且有了一定的积蓄，但是还不能充分理解财务问题，退休储蓄还不够充足。“退休计划完善度”的低分段人群比例最高，并且相对于 2021 年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说明我国大部分居民并没有充分的退休计划，甚至有接近五分之一的受访者完全没有退休计划。值得注意的是，今年设置辅助问题后，“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的中高分段人群比例相比去年大幅上升，这说明实际上我国居民大多都相信自己能够取得满意的退休收入，客观反映了居民对未来国家经济发展和个人的退休生活的信心较为充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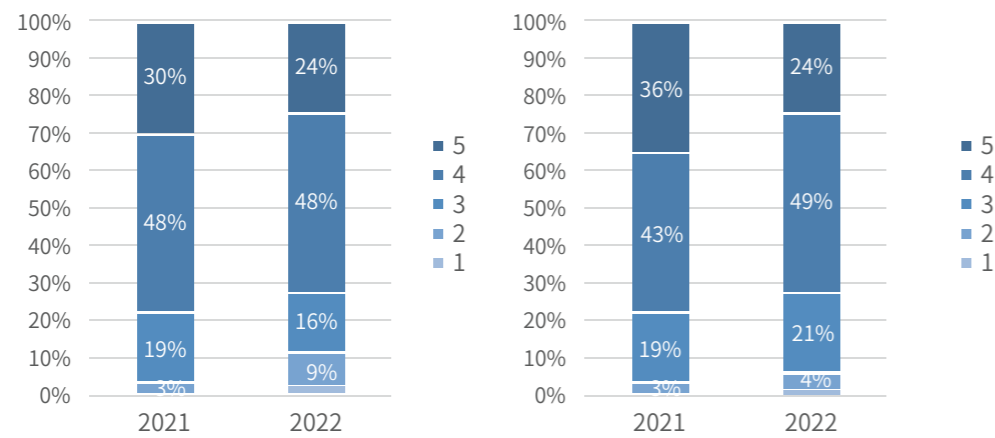


图 4.4 退休责任意识 (左) 与财务规划认知水平 (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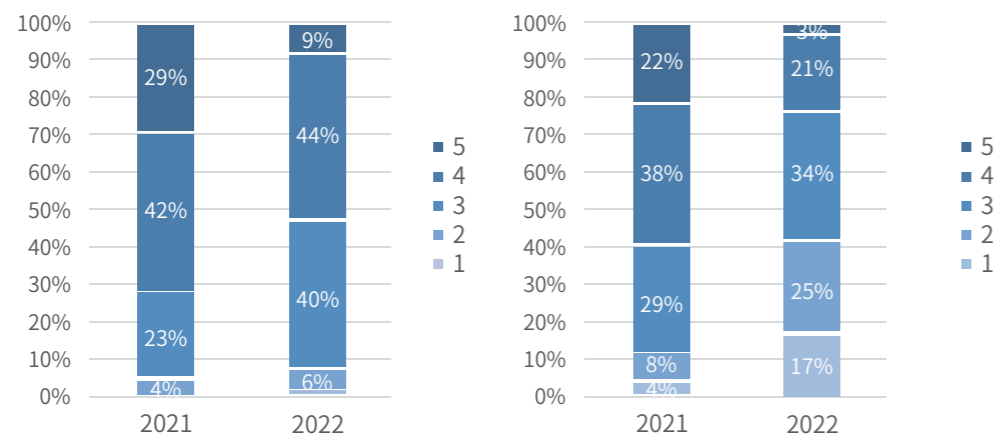


图 4.5 财务问题理解能力 (左) 与退休计划完善度 (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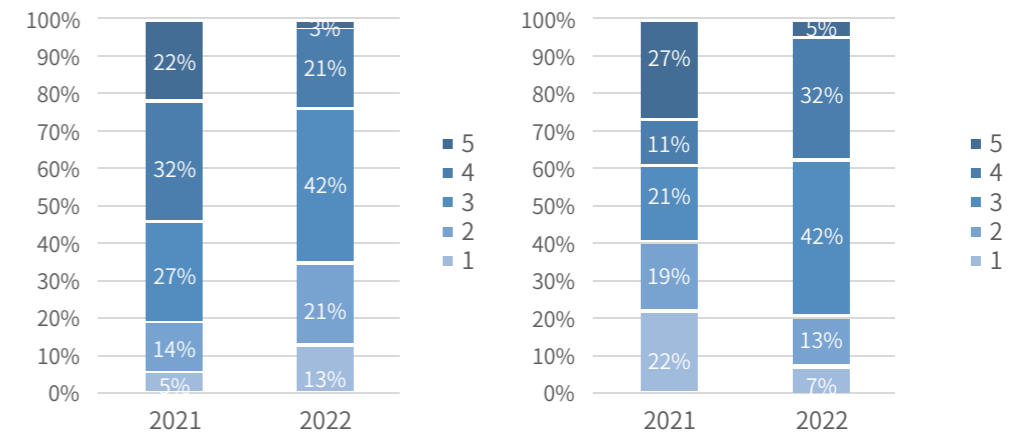


图 4.6 退休储蓄充分度 (左) 与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 (右)

### 4.1.3 国内不同地区退休准备指数的比较

为比较我国不同地区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我们分别对参与调研的各省的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进行了测算，结果如图 4.7 所示，不同省份的差异引人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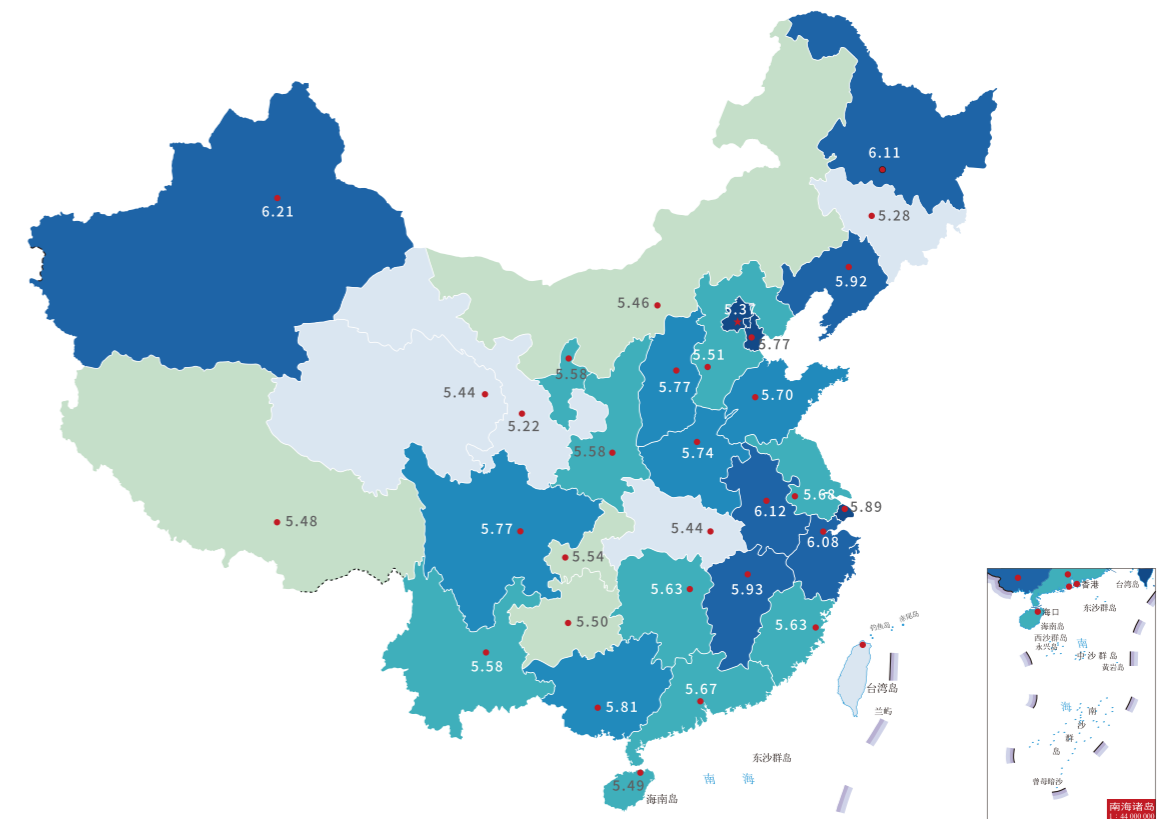


图 4.7 2022 年我国大陆各省份退休准备指数



与 2021 年相比，所有参与调研的省份的退休准备指数均有明显下降，这是对问卷的修改以及调研群体的差异造成的，2022 年的数据更能反映真实的退休准备情况。根据排序差异和居民退休准备指数下降的程度我们可以关注到不同省份居民退休准备状况的变化。

从相对排名来看，各参与调研的省份的退休准备指数排名较 2021 年有明显变化。西藏、重庆、海南、四川、江西五个省级行政区的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排名均下降了至少 15 位，其中西藏和重庆均下降了 27 位（西藏和重庆 2021 年排名分别为第 2 和第 4）。西部地区的退休准备指数排名下降明显，东部地区的退休准备指数排名有所上升。值得注意的是，东部与中部地区排名居前，而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排名靠后。这可能是因为在发达城市由于生活成本更高，需要更多的退休储蓄和更完备的配套设施以保障居民的退休生活，因此发达城市居民的退休准备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从绝对数值来看，同样是西部地区退休准备指数数值下降更为明显，而以江苏、广西、山东、广东为代表的沿海地区的退休准备指数下降较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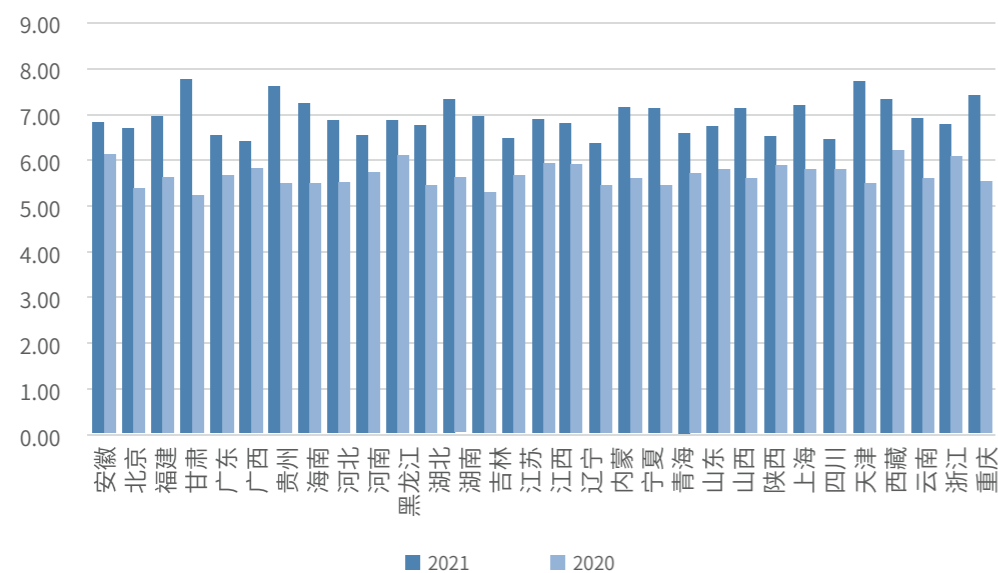


图 4.8 2021 年和 2022 年我国参与调研的各省份退休准备指数对比

## 4.2 高退休准备指数人群画像

根据 2022 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结果，中国高退休准备指数人群具有部分相似特征。具体可以归纳如下：男女退休准备指数差异基本消除；年长者退休准备指数更高；已婚且有子女的群体的退休准备指数更高；身心健康者退休准备指数更高；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退休准备指数更高；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职工指数更高；高收入群体的退休准备指数更高。

整体来看，高准备指数人群具有较为年长、已婚且有子女、身心健康、接受过高等教育、在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高个人收入与家庭收入等特征。在下文中，我们将对高准备指数人群的特征进行逐一分析。

### 4.2.1 个人特征：性别差异基本消除，年长者指数更高

2022 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女性略高于男性。继近几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性别差异逐年缩小之后，2022 年中国女性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超过男性，扭转了过去男高女低的性别差异特征。我们认为，如今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的性别差异基本消除，女性独立性与家庭地位的提高和即将出台的延迟退休政策都为女性居民能够进行更充分的退休准备提供了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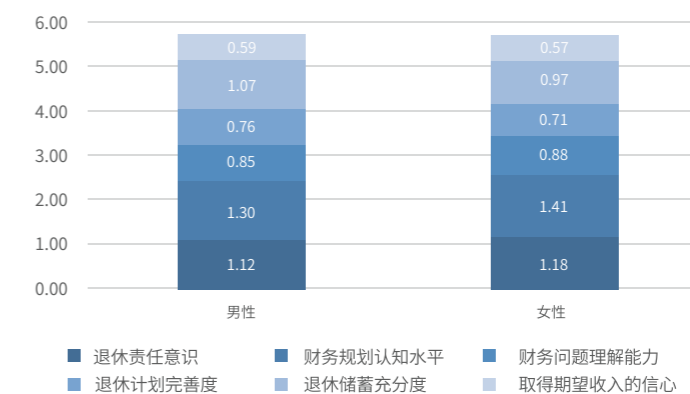


图 4.9 不同性别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在年龄方面，与往年的结果相似，越接近退休年龄的人群退休准备指数越高。18-25 岁的年轻受访者的平均退休准备指数只有 5.57，而 56-65 岁的临近退休的人群的平均退休准备指数高达 5.88。随着自身年龄越来越接近退休年龄，居民的退休储蓄越来越多，退休准备也越来越充分，同时退休政策、退休后的收入以及子女的发展状况的不确定性也大幅降低，因此年长者在“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退休储蓄充分度”、“退休计划完善度”三个维度均明显优于年轻人。年轻人还处在个人发展阶段，还没有充分的条件进行退休储蓄和完善退休计划，未来个人发展与政策的不确定性程度较高，因此年轻的群体退休准备指数较低。

值得注意的是，45 岁及以下的群体的“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和“财务问题理解能力”三个认知维度的平均值均高于 45 岁以上的群体，说明近年来我国社会的国民金融教育卓有成效，年轻的群体都能有较为积极的退休准备意识、较好的财务规划认知和较强的财务问题理解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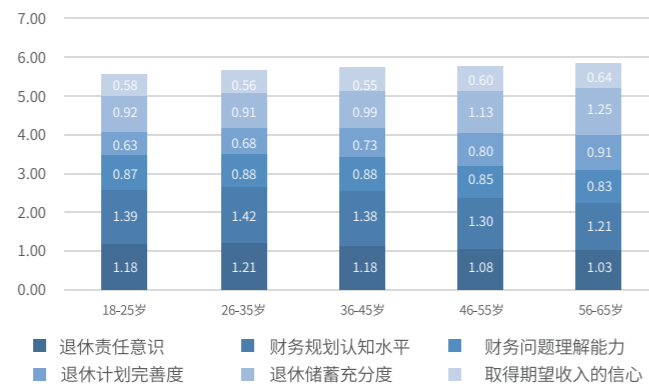


图 4.10 不同年龄段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 4.2.2 家庭特征：已婚且有子女的个人指数更高

从家庭特征来看，已婚的群体的退休准备指数最高，离婚、丧偶、再婚的群体退休准备指数较低。已婚的群体在组建家庭之后能够有计划地对未来进行财务规划以及生活计划，因此能够对退休生活进行良好的规划，同时，美满的家庭能够促进各个家庭成员有意识地对收入和支出进行合理规划，减少不必要的消费，从而具有较高的退休储蓄水平以及抗风险能力。而离婚、丧偶、再婚的群体由于经历过失败的婚姻或家庭生活受到冲击，对退休生活可能抱有较为悲观的想法，对于这三类群体，社会应当给予更多关注和在生活方面的帮助与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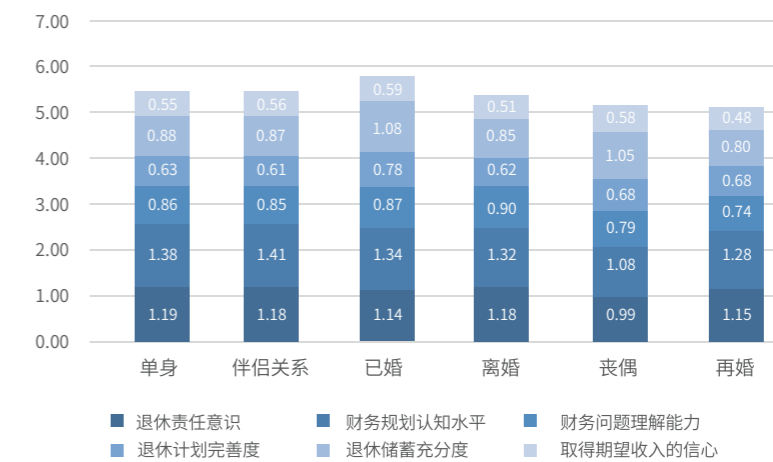


图 4.11 不同婚姻状况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有子女的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较高。有子女的群体通常家庭关系较为稳定，家庭收入波动小，能够形成较为完善的退休计划，并且有子女后家庭倾向于进行更多的储蓄，因此“退休计划完善度”和“退休储蓄充分度”都显著好于无子女的群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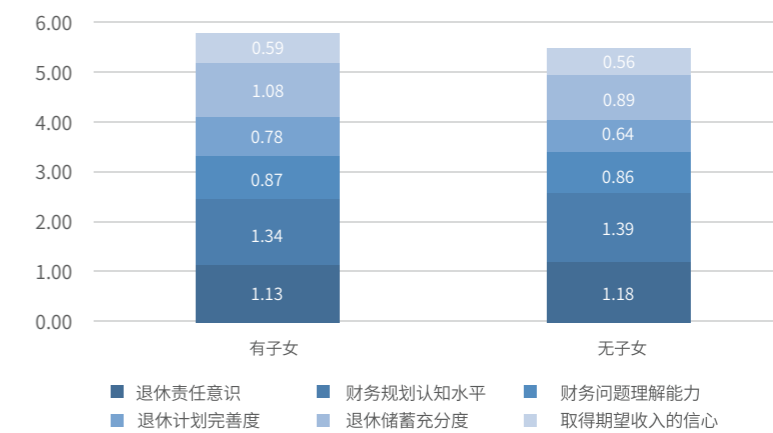


图 4.12 有子女和无子女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 4.2.3 健康特征：身体与心理健康状况越好，退休准备指数越高

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对群体退休准备指数有显著的影响，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越好，群体退休准备指数越高。身体与心理健康状况差的群体在“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和“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三个维度都有明显的不足，他们的健康状况已经较为严重地影响了现在的生活，自然没有充足的精力和行为去进行充分的退休准备，缺少收入来源和积蓄来满足自己未来的退休生活，因此，我们应当对健康状况不好的群体予以更多的关心照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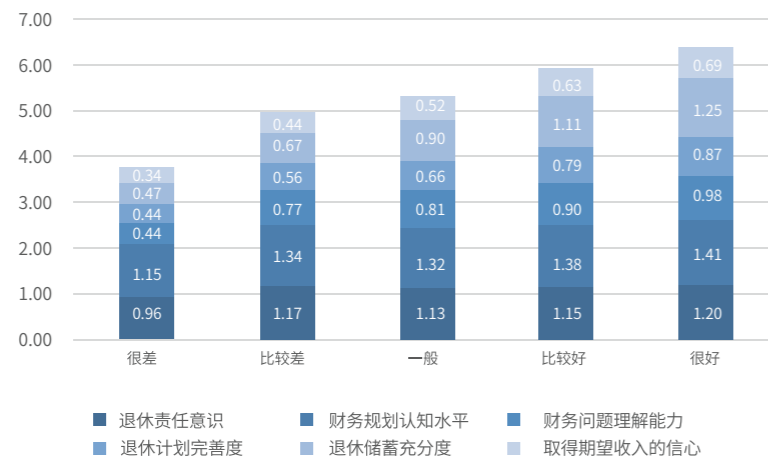


图 4.13 不同身体健康状况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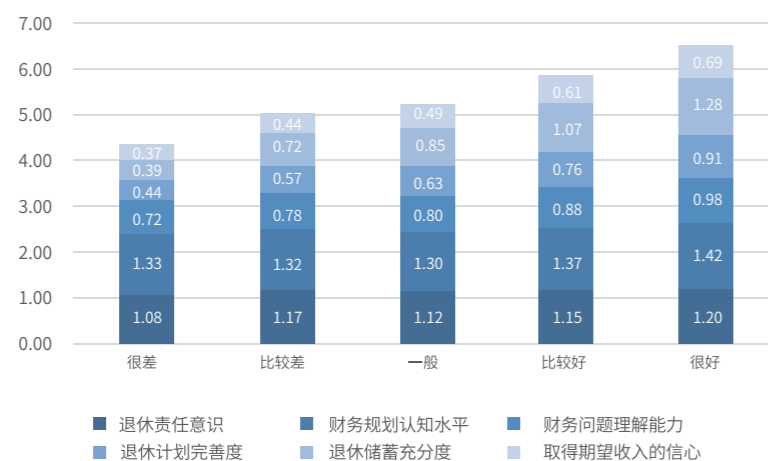


图 4.14 不同心理健康状况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 4.2.4 教育特征：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指数更高

总体而言，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退休准备指数越高，本科及研究生学历的群体的退休准备指数显著高于本科以下学历的群体。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通常对退休准备及财务问题的相关概念有更明确的认识，并且高学历的群体通常意味着更高的收入，所以他们的退休准备意愿会更强，也有更强的信心能够获得满意的期望退休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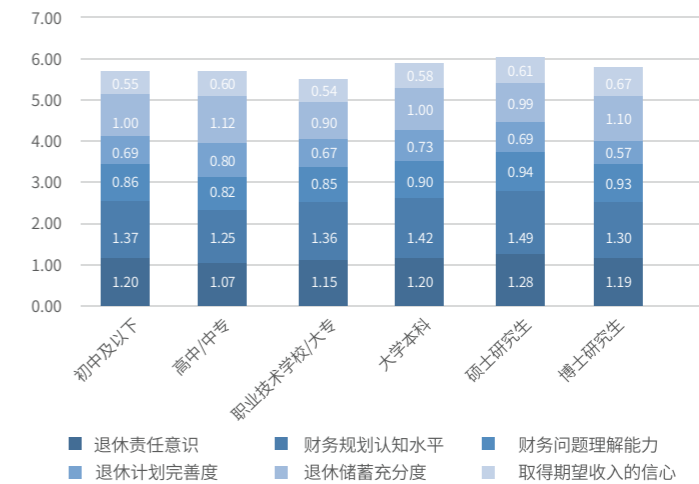


图 4.15 不同学历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 4.2.5 工作特征：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职工指数更高

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职工指数更高，以个人或家庭为工作单位的群体及无工作者退休准备指数较低。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通常有更加稳定的收入，工作不易出现变故，因此更加易于对未来的退休生活进行合理的计划，并且由于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能够提供更好的员工福利待遇与多方位保障，在员工退休福利计划和作为养老体系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方面也有较好的表现，因此，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职工退休准备更有保障。而与之相对比，以个人或家庭为工作单位的群体及无工作者收入波动较大，部分甚至没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也没有足够的积蓄来保证未来的退休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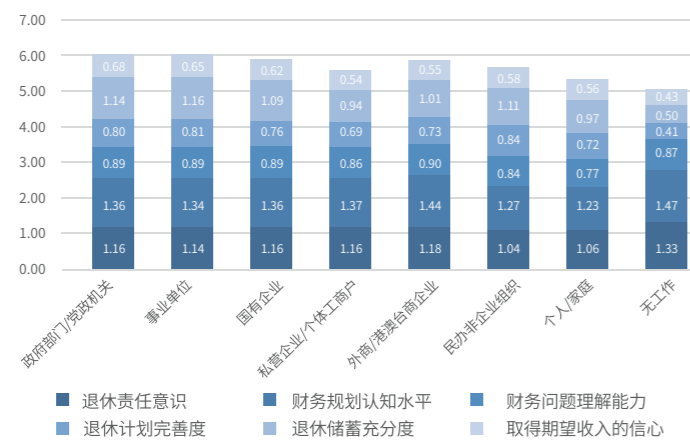


图 4.16 不同学历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 4.2.6 收入特征：个人和家庭收入与退休准备指数正相关

研究发现，个人收入与家庭收入高的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更高。我们根据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的数值分别分为从低到高的 24 组，对每一个个人收入组和家庭收入组分别计算了退休准备指数，并绘制了如下针对个人收入组和家庭收入组的退休准备指数的散点图。结果显示，大体上个人收入水平和家庭收入水平均与退休准备指数有正向相关性，即高收入人群通常能够进行更多的退休储蓄，并且有意识地进行退休规划，积极进行资产配置，对退休后能够取得期望的收入充满信心，因此退休准备较为充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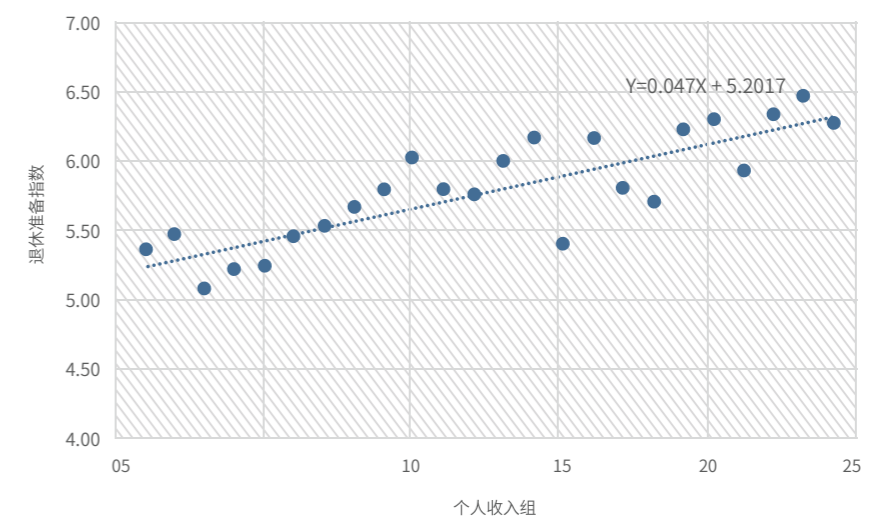


图 4.17 不同个人收入水平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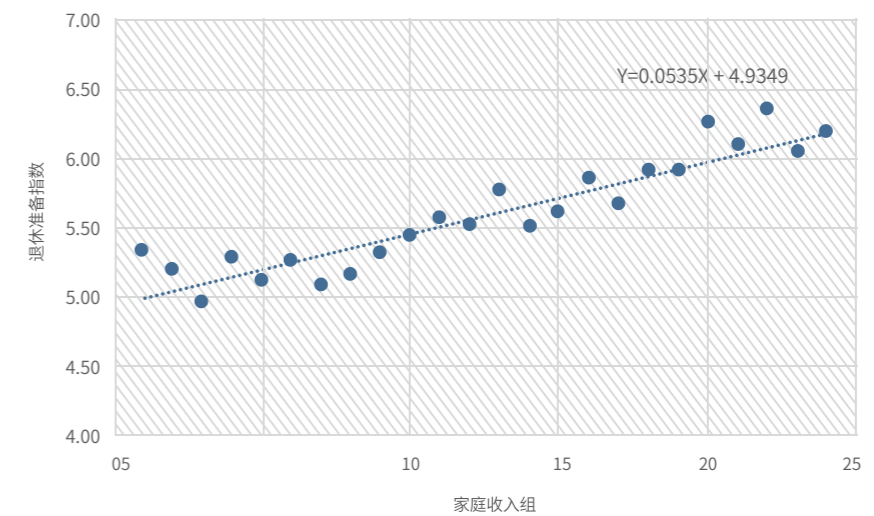


图 4.18 不同家庭收入水平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 05. 中国居民的退休财务规划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截至 2021 年底，我国 65 岁及以上老人占比 14.2%，已超过 14% 的深度老龄化线，我国正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我国居民平均预期寿命达 77.93 岁，且预期寿命不断增长，老龄化程度加速提升，居民养老需求旺盛。深入了解居民养老的具体规划和需求，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是保险和养老相关行业最关心的话题。本章将从退休财务准备动机、退休财务准备方式和退休财务准备需求 3 个方面深入了解中国居民的退休财务规划。

### 5.1 退休财务准备动机

#### 5.1.1 退休规划动机：身体出现衰老征兆是退休规划的最普遍原因

如图 5.1 所示，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人们进行退休规划的最主要的动机是出现了身体衰老的征兆**，占 64%。其次，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越晚进行退休准备资金压力会越大，对退休规划的态度更为主动。还有 38% 的受访者表示是受到了周边人的影响才进行退休规划。由于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家庭，所以子女远离和子女关心度不够也是导致人们进行退休规划的主要原因，分别占 22% 和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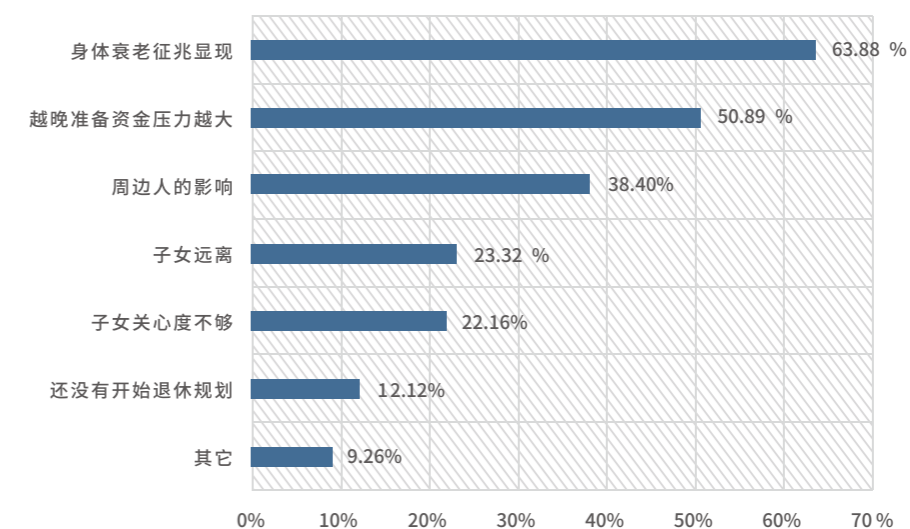


图 5.1 受访者的退休规划动机

不同年龄段人群的退休规划动机也产生了一定分化。总体上，尚未进行退休规划的人群比例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在 18-25 岁的青年群体中有 20% 的人没有退休规划，而在 46 岁以上的中年群体中，这一比例下降至不到 10%。而无论在哪个年龄群体中，“身体衰老征兆显现”和“越晚准备压力越大”都是最主要的两个动机，但是在 36-45 岁的群体中，这两个原因的占比更高，分别达到了 68% 和 59%，这也可能与人们常常担心的“中年危机”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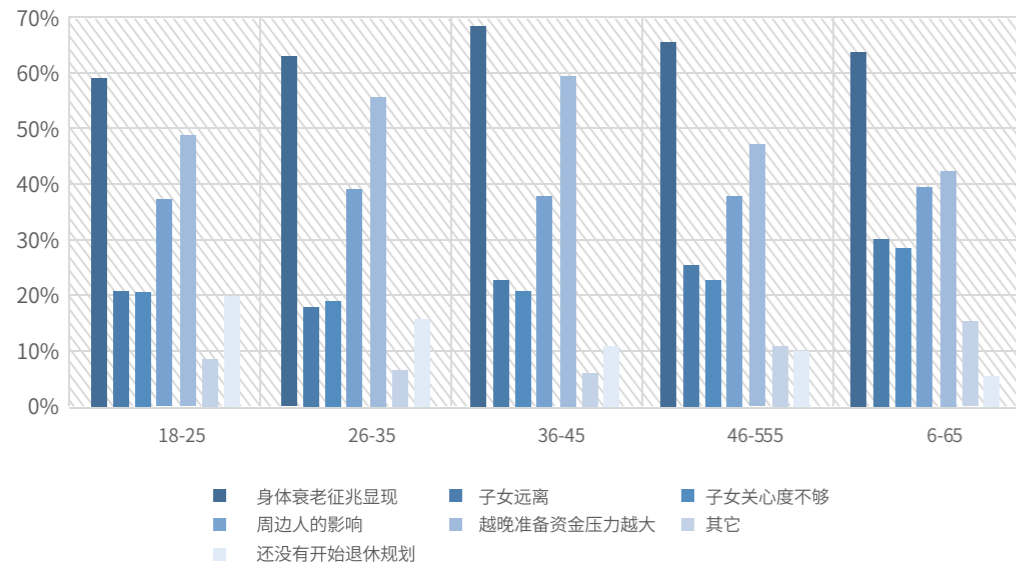


图 5.2 不同年龄段受访者的退休规划动机

### 5.1.2 激励储蓄方式：减税措施最容易促使人们进行更多储蓄

税收优惠是鼓励人们进行养老储蓄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如图 5.3 所示，38% 的受访者认为养老金的减税政策会促使他们进行更多退休储蓄。此外，由于多数居民缺乏金融财务方面的知识基础，提供财务方面的教育和专业的财务建议也能有效促进大家进行养老储蓄。进一步，我们将所有受访者按照税前年收入的中位数 8 万元划分为两组，如图 5.4 所示，可以看出高收入居民更在意养老金的税收优惠，同时也更看重专业的财务教育和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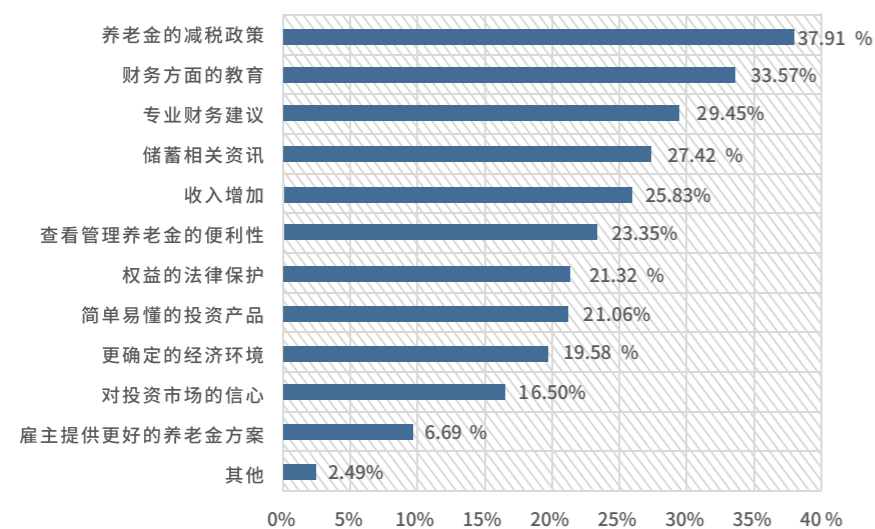


图 5.3 促使受访者进行更多退休储蓄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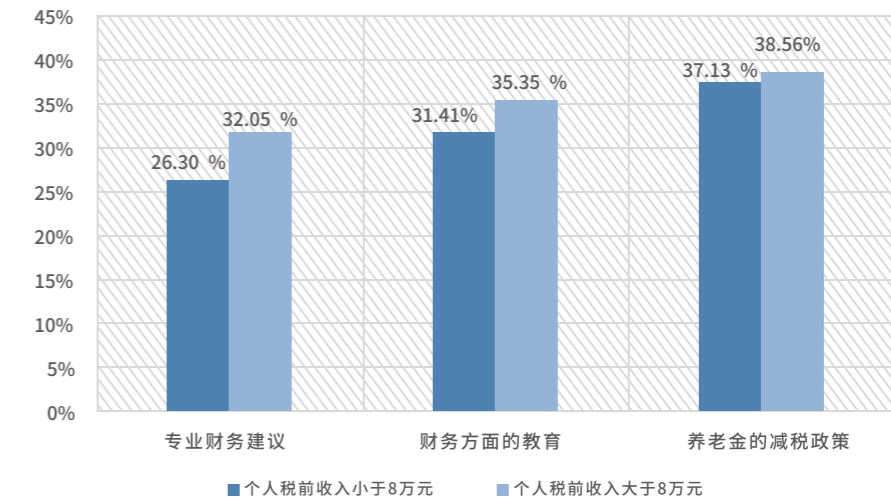


图 5.4 不同收入水平的受访者的储蓄驱动力不同

## 5.2 退休财务准备方式

### 5.2.1 养老金积累方式：希望每月定额储蓄，但实际操作有一定难度

调查结果显示，相对于不定额储蓄的方式，居民更倾向于有规划的定额储蓄方式来为自己积累养老金。对于希望的养老金积累方式，在未退休的受访者中有 36% 的人选择了每月定额储蓄，比选择每月不定额储蓄的人多出 10%；有 24% 的人选择了每年定额储蓄，比选择每年不定额储蓄的人多出 12%；仅 2% 的人选择退休前一次性储蓄。

然而，针对已退休受访者的调查结果显示，定额储蓄的方式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定困难。仅 28% 的退休居民实际采取了每月定额储蓄的方式，比未退休居民少 8%，而高达 21% 的退休居民实际采取了每年不定额储蓄的方式，比未退休居民多 9%。由此可见，由于缺乏财务规划，很多居民无法实现自己所希望的定额储蓄方式，而通过养老金融产品的“强制”储蓄特性或许可以辅助居民实现这一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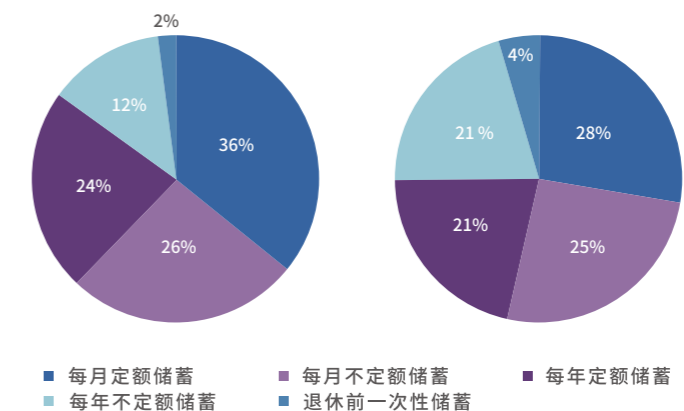


图 5.5 已退休者（左）和未退休者（右）的养老金积累方式

### 5.2.2 养老金收入来源：预期收入主要来自政府，不同职业有所分化

政府、企业、个人是养老金收入的三大来源，也称为“三支柱”养老体系。第一支柱是政府建立公共养老金，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是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在基本养老保险之外建立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等职业养老金；第三支柱是个人通过购买各类商业养老保险、养老基金、养老理财等产品自愿建立的个人养老金。从宏观上来看，我国三支柱养老体系发展并不均衡，根据人社部的调查数据，截至 21 年末我国第一支柱规模约 6.4 万亿元，占比 56%；第二支柱规模约 4.4 万亿元，占比 38%；第三支柱规模仅 7246 亿元，占比 6%。

在微观层面，为研究居民的养老储蓄观念，我们也对居民预期的养老金收入来源进行了调查。平均而言，受访者认为 40% 的养老金收入来自于政府，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这与宏观上我国第一支柱规模占比最大的事实一致。然而我国第一支柱的养老金替代率偏低，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为例，2020 年其替代率仅为 36%，远低于国际上的养老金替代率警戒线 55%，这也催生了我国居民越来越强的自主养老储蓄意识。整体上受访者认为来自于个人的养老金收入将占 35%，高于来自于企业的养老金收入，和来自政府的养老金收入几乎持平。而不同行业从业者对养老金收入的来源预期也有所不同，如图 5.7 所示，在政府部门的从业者认为自己的退休金超过 50% 来源于政府；而受雇于个人/家庭的居民则认为这一比例仅为 35%，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个人养老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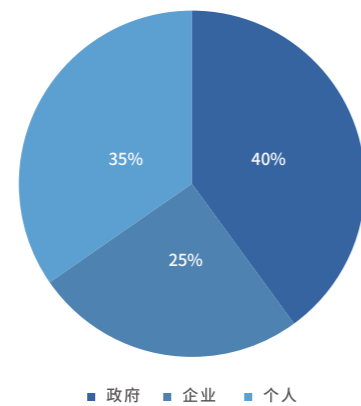


图 5.6 受访者预期的养老金收入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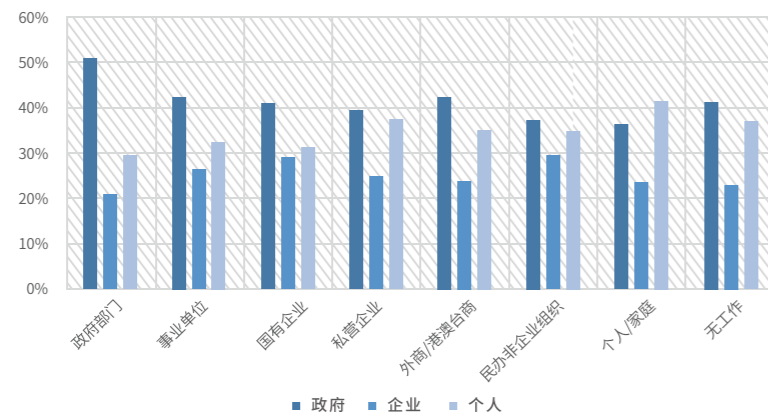


图 5.7 不同受雇单位受访者的预期养老金来源

### 5.2.3 具体财务准备方式：金融产品中商业保险更受青睐

我们对受访者的退休财务准备方式进行了调查，结果如图 5.8 所示。可以看到，在未退休受访者中有 43% 的人购买了商业保险，在已退休受访者中有 40% 的人购买了商业保险，**商业保险已经超过银行储蓄，成为了除社会保险外最主要的退休准备方式**。产品层面，保险产品具有保证收益、长期锁息、多样化领取、附加保障及康养服务等独特优势。种类丰富的商业保险可以满足不同群体多样的退休准备需求，显然比产品单一、同质化严重的银行储蓄更具有吸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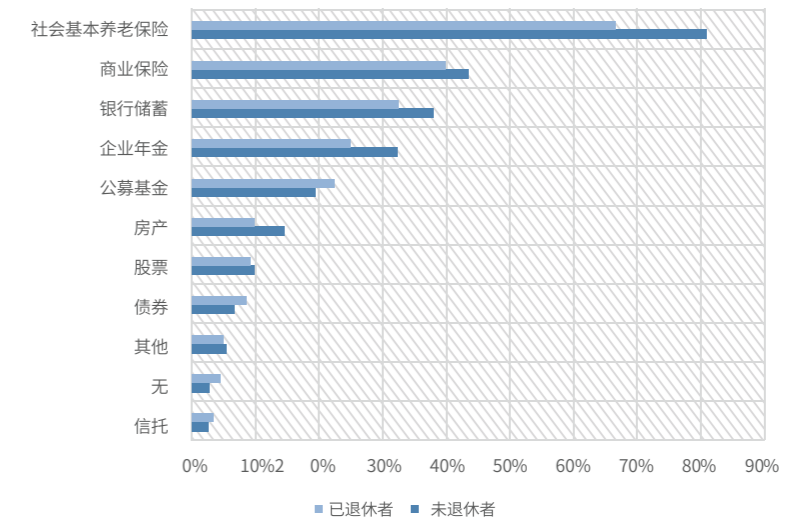


图 5.8 受访者具体的财务准备方式

图 5.9 展示了购买过商业保险的受访者具体的购买情况，**无论是在已退休人群还是未退休人群中，寿险都是最受欢迎的保险产品，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购买过寿险**。其次受欢迎的是商业养老保险和健康险，有 42% 的未退休者和 34% 的已退休者购买过商业养老保险，有 36% 的未退休者和 27% 的已退休者购买过健康/医疗/重疾险。而投资连结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作为非主流保险产品，投保人对它们的了解较少，购买比例也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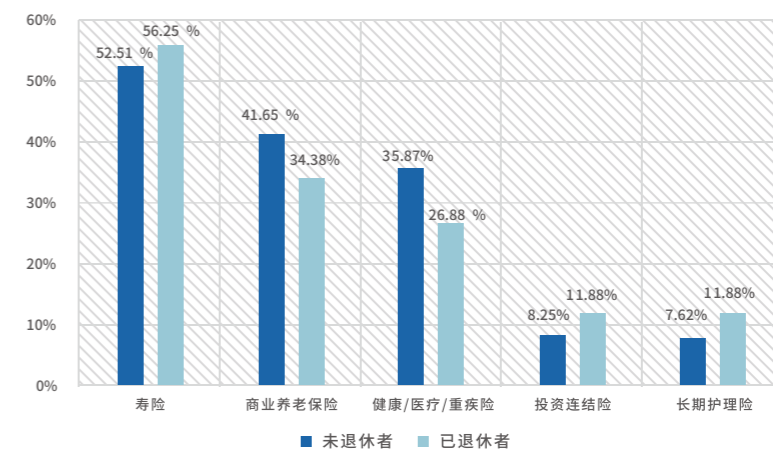


图 5.9 受访者对商业保险具体品种的选择

### 5.2.4 对财务建议的信任：人们更愿意相信政府和亲属

我们调查了居民对财务建议的信任程度，结果发现居民对来自不同主体的建议信任接受程度有明显不同。**整体而言，人们更愿意相信来自政府和亲属的建议**，有 58% 的受访者对政府的建议信任程度在“一般信任”以上，有 68% 的受访者对亲属的建议信任程度在“一般信任”以上。而人们对个人理财网站和媒体的信任程度最低，有 40% 的受访者不信任个人理财网站，有 42% 的受访者不信任媒体。对于企业、银行、保险公司等专业机构顾问的财务建议，受访者的信任程度比较中性。

信任程度	政府/公共部门	企业/雇主	个人理财网站
完全不信任	2%	4%	13%
比较不信任	5%	13%	28%
一般信任	35%	56%	45%
比较信任	45%	23%	12%
完全信任	13%	4%	2%

信任程度	银行/理财机构顾问	保险公司/代理人	理财规划师
完全不信任	6%	10%	9%
比较不信任	16%	26%	20%
一般信任	50%	48%	48%
比较信任	24%	14%	20%
完全信任	4%	2%	3%

信任程度	媒体	配偶/子女/兄弟姐妹	朋友/同事
完全不信任	13%	1%	5%
比较不信任	29%	4%	11%
一般信任	46%	27%	53%
比较信任	9%	51%	28%
完全信任	2%	17%	2%

图 5.10 受访者对各方财务建议的信任程度

## 5.3 退休财务准备需求

### 5.3.1 金融产品特色需求：最在意安全性、透明性和流动性

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受访者普遍对养老金融产品的风险偏好低，流动性偏好高**。有 40% 的受访者认为保证本金安全极其重要，有 32% 的受访者认为在有需要时能将养老金及时、便捷地提取出来，满足流动性需求极其重要。由于担心可能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受访者普遍要求养老金账户投资信息应公开透明，认为这一点“比较重要”和“极其重要”的受访者占比 82%。另外，有养老金不代表能购买到优质养老服务，有 28% 的受访者认为养老金融产品附加养老相关服务是极其重要的，因此整合养老产业链，提供“养老金+康养服务”产品，是养老金融产品提供方关注的方向。对于投资收益，受访者的期望并不高，有 29% 的受访者认为能够获得超过通胀的投资收益只是一般重要的事情，仅 17% 的受访者认为投资收益极其重要。

结合调查结果，我们不难构想出在未来最受居民欢迎的养老金融产品形式：**投资于高流动性低风险货币基金或短期债券，投资账户信息全部公开透明，同时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养老相关服务。**

重要性	保证本金安全	适当投资收益	流动性需求
完全不重要	1%	1%	1%
比较不重要	3%	4%	2%
一般重要	17%	29%	20%
比较重要	39%	49%	45%
极其重要	40%	17%	32%

重要性	账户投资信息公开透明	附加养老相关服务	有利于财富传承
完全不重要	1%	1%	2%
比较不重要	2%	3%	7%
一般重要	16%	21%	35%
比较重要	41%	48%	38%
极其重要	41%	28%	18%

图 5.11 受访者对养老金融产品的需求

### 5.3.2 财务规划服务需求：希望更全面的养老规划咨询服务

上升到公司层面，我们调查了受访者选择一家机构养老金融产品的主要考虑因素，有 62% 的人选择了“帮助制定退休财务规划”，有 53% 的人选择了“提供一套系统、科学的养老管理服务方案”。由此可见，相比金融产品本身，人们更希望从专业机构获得全面、专业的养老规划咨询服务，而在产品日趋同质化的当下，**提供差异化的养老顾问服务将会成为养老金融行业的下一个竞争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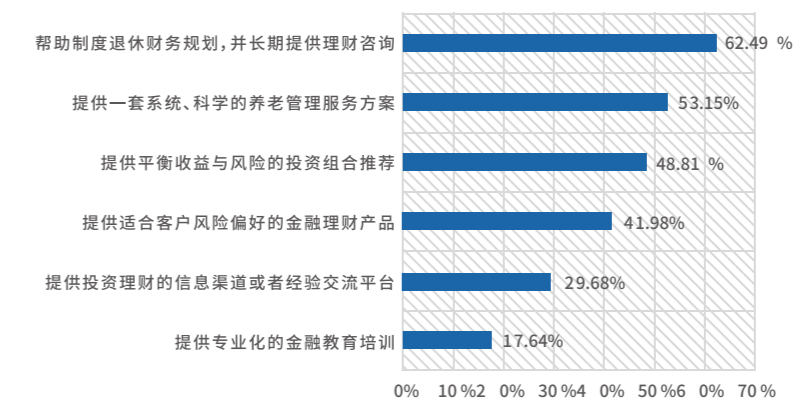


图 5.12 受访者选择机构养老金融产品的考虑因素

### 5.3.3 健康管理服务需求：认为疾病预防类服务可以改善退休生活品质

健康管理服务是以促进人们健康为目的，运用医学、管理学等学科理论、技术和方法，对个人健康状况和健康风险因素进行全面检查、评估、干预的过程，符合现代健康概念和中医“治未病”思想。和医疗服务不同，健康管理服务面向的是全部人群，以健康、亚健康、慢性病患者和老年群体为重点服务对象。

我们调查了受访者认为哪些健康管理服务可以有效改善退休后生活质量，如图 5.13，选择疾病预防服务的受访者比例最高，占 59%；选择健康体检的受访者比例最低，占 20%。受访者其余几项健康管理服务的偏好差别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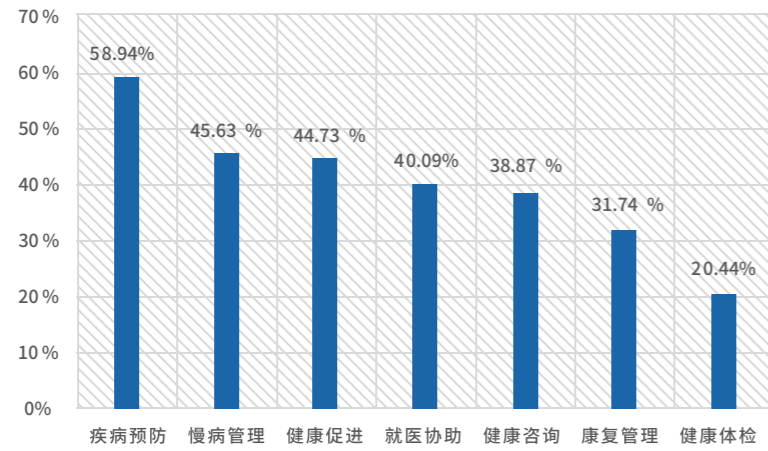


图 5.13 受访者认为哪些服务可以有效改善退休后生活质量

### 5.3.4 企业退休服务需求：期待灵活的退休制度安排

除了政府和居民自己外，企业也是居民退休保障的重要力量。作为雇主，企业有责任也有义务为退休员工提供企业退休服务。我们向受访者调查了“在退休准备方面，您最希望自身所在的企业为您提供哪些方面的服务和帮助？”，得到的结果如图 5.14 所示，有超过 60% 的受访者希望雇主为其提供灵活的退休制度安排，远超其他需求。由此可见，随着我国老龄化和少子化程度加深，结合退休收入替代率低的现实，越来越多的居民希望适当延迟自己的退休年龄，在老年时仍然获得部分工作收入来改善生活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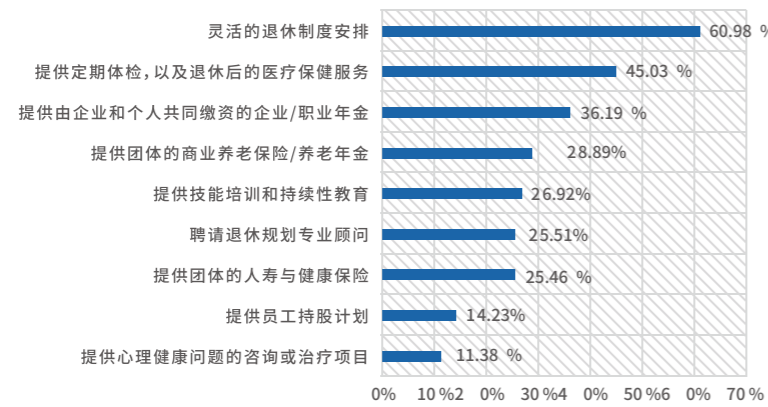


图 5.14 受访者希望自身所在的企业提供哪些服务和帮助



## 06. 专题研究

### 6.1 中国居民的金融素养

#### 6.1.1 居民金融素养客观上存在不足，主要受到教育水平影响

金融素养 (Financial literacy) 是指个体能够高效合理地管理和处理其所拥有的私人金融资产和金融事务的知识和能力，也是个体对各金融领域的受教育程度和认知水平。国际上通用的衡量金融素养的方式是由美国学者 Lusardi 和 Mitchell 在 2004 年设计的三道选择题 (国际常称为“三大问题”)，分别考察被调查者对于复利、通货膨胀、风险分散三个方面的金融知识和投资意识具备情况，从而做出对其金融素养的评估，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代表性。本次问卷中使用了这“三大问题”来衡量受访者的基本金融素养。“三大问题”的具体内容与受访者的回答情况如表 6.1、表 6.2 所示。

表 6.1 关于金融素养 (Financial Literacy) 的 3 个问题

**题1【复利题】**假如您的储蓄账户中存有1000元人民币，储蓄利率为每年2%，若您将这笔钱放在账户中不做变动，您认为5年后您的账户中将有多少人民币？

请选择：

- A. 多于1020元人民币
- B. 正好1020元人民币
- C. 少于1020元人民币
- D. 不知道
- E. 拒绝回答

**题2【通货膨胀题】**假如您的储蓄账户的年利率为1%，年通货膨胀率为2%。1年后您在账户中将拥有多少储蓄可用于消费？

请选择：

- A. 比今天的储蓄多
- B. 与今天的储蓄相等
- C. 比今天的储蓄少
- D. 不知道
- E. 拒绝回答

**题3【风险分散题】**您认为以下的表述是否正确？“购买一个单一公司的股票往往比购买一个股票共同基金提供更加安全的回报。”

请选择：

- A. 这个表述是正确的
- B. 这个表述是错误的
- C. 不知道
- D. 拒绝回答

表 6.2 受访者对 3 道金融素养问题的回答

题号	题目选项	选择该选项的人数	人数占比
1	a <b>多于1020元人民币(正确)</b>	<b>2934</b>	<b>73%</b>
	b 正好1020元人民币	287	7%
	c 少于1020元人民币	318	8%
	d 我不知道	317	8%
	e 拒绝回答	170	4%
2	a 比今天的储蓄多	572	14%
	b 与今天的储蓄相等	316	8%
	c <b>比今天的储蓄少(正确)</b>	<b>2460</b>	<b>61%</b>
	d 我不知道	515	13%
	e 拒绝回答	163	4%
3	a 这个表述是正确的	748	19%
	b <b>这个表述是错误的(正确)</b>	<b>1729</b>	<b>43%</b>
	c 我不知道	1352	34%
	d 拒绝回答	197	5%

调研结果显示，我国居民总体的金融素养水平较为欠缺。在“三大问题”当中，受访者对于存款利率和通货膨胀相关知识掌握较好，本次调研受访者在复利和通货膨胀两道题目中正确率分别达到了 73%、61%。相比之下，只有 43% 的受访者答对了关于风险分散的问题，说明我国居民对于权益类金融产品投资和风险管理方面具有的知识仍有欠缺，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存款利率和通货膨胀是我国居民较为熟悉的金融话题，且存款相比于股票和共同基金在大众在日常生活中更为常见。这一结果也启示我们如果想要提升我国居民的金融素养，应该更多地向大众普及风险和收益相关知识。

我们对所有中国受访者按照不同年龄段、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工作状态和收入水平等进行了划分，分别来观察他们的金融素养，结果见表 6.3，表中加粗带下划线的数字为正确率比例最高的人群类型。

**男性和女性之间以及不同婚姻状况的受访者之间的金融素养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从不同的年龄组来看，年龄在 26-35 岁之间的受访者表现出了较高的金融素养，这一组受访者在“三大问题”上的正确率分别为 80%、72%、51%，均为所有年龄组中最高水平。26-35 岁之间的受访者三道题全部正确的受访者比例达到了 37%，在年龄更大的年龄组当中，三道题全部正确的比例递减，56-65 岁受访者当中只有 17% 全部正确。进一步的，我们发现**已经退休的居民在金融素养的三个问题上的正确率明显低于未退休受访者**，这一结果和年长受访者正确率低的结果相互印证。

在不同受教育水平的群体当中，我们发现学历水平越高的受访者在回答金融素养问题时正确率越高，硕士研究生在“三大问题”上的正确率高达 91%、92%、71%（博士研究生的正确率相对于硕士研究生略有降低，原因可能是由于该组受访者样本量较小导致的样本偏差）。这一结果说明**受教育水平对于中国居民金融素养影响较为明显，学历水平越高的居民金融素养普遍越高**。由于老一辈居民的教育普及程度低于年轻一代居民，前述已退休者、高龄居民金融素养较低的现象也可以被教育水平这一因素部分解释。

表 6.3 不同特征受访者回答金融素养“三大问题”的正确率

特征	分类	总人数	题1正确(%)	题2正确(%)	题3正确(%)	全部正确
年龄	18-25岁	603	75%	62%	46%	31%
	<b>26-35岁</b>	1002	<b>80%</b>	<b>72%</b>	<b>51%</b>	<b>37%</b>
	36-45岁	810	78%	71%	48%	34%
	46-55岁	811	69%	55%	38%	25%
	56-65岁	800	62%	42%	31%	17%
性别	<b>男性</b>	2026	<b>73%</b>	<b>62%</b>	42%	<b>30%</b>
	女性	2000	73%	60%	<b>44%</b>	28%
工作状态	<b>未退休</b>	3624	<b>74%</b>	<b>63%</b>	<b>44%</b>	<b>31%</b>
	已退休	402	59%	42%	30%	15%
婚姻状况	单身	742	76%	67%	46%	32%
	<b>伴侣/未婚</b>	308	<b>77%</b>	66%	47%	<b>33%</b>
	已婚	2816	72%	59%	42%	28%
	离婚	93	72%	68%	42%	30%
	丧偶	47	49%	38%	40%	13%
	再婚	20	65%	<b>70%</b>	<b>50%</b>	30%
学历水平	初中及以下	163	63%	45%	34%	15%
	高中/中专	1416	64%	43%	31%	17%
	技校/大专	803	72%	63%	42%	26%
	大学本科	1423	81%	75%	53%	40%
	<b>硕士研究生</b>	195	<b>91%</b>	<b>92%</b>	<b>71%</b>	<b>64%</b>
博士研究生	26	81%	73%	42%	27%	

### 6.1.2 居民对自身金融素养的认知不足，存在过度自信现象

在问卷中，受访者回答了关于金融素养的“三大问题”后，我们紧接着询问了受访者对自己的答案正确与否的看法：

请给下面每一种结果一个您认为的可能的百分率（填入的百分率数字加总等于 100）。

- (1) 三个问题都答对的概率：\_\_\_%
- (2) 只答对两个问题的概率：\_\_\_%
- (3) 只答对一个问题的概率：\_\_\_%
- (4) 三个问题都不对的概率：\_\_\_%

我们利用受访者给出的概率分布计算受访者对于自己正确题目的预期数，并将受访者的实际正确题数与之对比。如果预期正确题数高于实际平均正确题数，说明受访者存在过度自信现象。如表 6.4 所示，**我国居民对于自身的金融素养整体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过度自信现象**，仅有少数组别的受访者的过度自信程度接近于 0 或小于 0。

从表 6.4 中可以看出，具有不同特征的居民对自身金融素养的主观认知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年长、已退休的居民金融素养较为薄弱，同时表现出了较高程度的过度自信**，年龄在 56-65 岁之间的受访者过度自信程度在各年龄组当中最高，已退休居民过度自信程度高达 0.44，远高于未退休者的 0.08。另外，男性受访者的过度自信程度要显著高于女性。

在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受访者之间对比，我们发现剔除博士研究生这一组样本量较少的群体后，**学历越高的受访者金融素养越好，同时过度自信程度下降**。学历为初中、高中 / 中专的受访者过度自信程度最高，分别为 0.31、0.35。在不同教育水平的组别中，职业技术学校 / 大专、大学本科学历的居民对金融素养的认知相对来说与实际情况较为接近。

表 6.4 不同特征受访者对自身金融素养的主观认知情况

特征	分类	总人数	平均正确	预期正确	过度自信程度
年龄	18-25岁	603	1.83	1.86	0.03
	26-35岁	1002	2.03	1.95	-0.07
	36-45岁	810	1.97	2.01	0.04
	46-55岁	811	1.61	1.84	0.23
	<b>56-65岁</b>	800	1.35	1.73	<b>0.38</b>
性别	<b>男性</b>	2026	1.77	1.91	<b>0.14</b>
	女性	2000	1.77	1.86	0.09
工作状态	未退休	3624	1.82	1.90	0.08
	<b>已退休</b>	402	1.31	1.75	<b>0.44</b>
婚姻状况	单身	742	1.89	1.89	0.00
	伴侣/未婚	308	1.89	1.90	0.00
	已婚	2816	1.73	1.89	0.16
	离婚	93	1.82	1.81	-0.01
	<b>丧偶</b>	47	1.28	1.67	<b>0.39</b>
受教育水平	再婚	20	1.85	1.84	-0.01
	初中及以下	163	1.42	1.73	0.31
	<b>高中/中专</b>	1416	1.38	1.73	<b>0.35</b>
	技校/大专	803	1.78	1.84	0.06
	大学本科	1423	2.09	2.01	-0.08
	硕士研究生	195	2.54	2.34	-0.20
博士研究生	26	1.96	2.22	0.26	



## 6.2 中国居民对延迟退休政策的态度

随着社会经济与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居民的健康水平逐年提升。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21 年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我国居民的人均预期寿命上升至 78.2 岁，宣告迈入长寿时代。我国居民人均寿命的进一步上升已经成为未来的社会趋势，而我国职工现行退休年龄仍按照改革开放初期所制订的标准，即男性 60 周岁、女干部 55 周岁、女工人 50 周岁。在长寿时代，这一退休年龄标准既不能应对人口老龄化带给社会经济的巨大挑战，也不能满足我国居民对退休生活的美好愿景与追求。

因此，国家计划在未来推出渐进式的延迟退休政策。2020 年 11 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便明确提出要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所谓“渐进式”，在国际上通常是指以每年延迟 2-3 个月的方式，在 10-20 年内逐步延迟到目标退休年龄。目前，尽管延迟退休具体的政策措施尚未公布，但社会舆论已对其关注很久，我们希望调查和了解广大居民对延迟退休政策的支持态度，探索延迟退休政策的推出会对居民的退休准备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本次调研中，通过设计假设性问卷，我们在三种可能的延迟退休政策方案下，分别询问受访居民对该政策的支持态度，以及是否会因此改变自身的退休储蓄水平。三种可能的政策方案是：

- (1) 渐进式地延长退休与社保养老金待遇领取年龄至男性 65 岁、女性 60 岁；
- (2) 保持退休年龄和社保养老金待遇领取年龄不变（即男性 60 岁，女性 55 岁），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待遇水平，以维持社保基金的收支平衡；
- (3) 延迟退休年龄至男性 65 岁、女性 60 岁，同时实施弹性退休制度，个人可以选择将实际退休和社保养老金待遇领取年龄提前（比如男性 62 岁）或者延后（比如男性 68 岁），待遇水平依据实际退休年龄而调整。

在下述分析中，我们分别将三种政策简称为“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维持基金平衡的政策”和“弹性退休政策”。

### 6.2.1 居民对于延迟退休政策的支持意愿有待提高

总体而言，中国居民对于延迟退休政策的态度较为保守，对弹性退休政策最为支持。如图 6.1 所示，在三种可能的政策方案中，对延迟退休保持中立态度的受访者都占据了最大的比例，约为 40%，说明有相当比例的居民对延迟退休政策的理解认识还十分有限，难以想象在未来政策推出后会对自身产生怎样的影响，因此持有相对保守的态度。比较三种政策，受访者对于弹性退休政策更为支持，有 31.3% 的受访者对弹性退休政策表示支持态度，超过了反对该政策的受访者比例。因此，受访者总体上对弹性退休政策具有支持的倾向。在另两种方案中，受访者相对支持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而更为反对维持基金平衡、降低待遇水平的政策，说明人们为维持退休生活后的生活品质宁愿付出额外的劳动去积累养老金，也不愿意被动地降低退休后的收入与生活品质。以上倾向可总结为，居民愿意为维持退休生活而在一定程度上延迟退休，但对

延长期限仍存在有担忧与顾虑。

在延迟退休政策的背景下，中国居民更倾向于增加自身的退休储蓄水平。如图 6.2 所示，在三种可能的政策方案下，都有超过 75% 的受访者选择保持或者增加自己的退休储蓄。由于延迟退休本身是积累和增加退休储蓄的方式，受访者在此基础上愿意额外增加退休储蓄，说明延迟退休政策有助于提升居民的退休责任意识，引导居民认识到在老龄化时代自身应当履行更多的退休收入责任。

在弹性退休政策的背景下，我们进一步询问了受访者对退休时点的选择倾向。如图 6.3 所示，在男性 65 岁、女性 60 岁的退休年龄标准下，44.9% 的受访者愿意提前退休，36.9% 的受访者愿意按时退休，仅有 10.6% 的受访者愿意延后退休，说明尽管弹性退休政策更受欢迎，大部分居民更倾向于时长在五年以内、适度的延迟退休，反对过度的延迟退休。此外，受访者对弹性退休政策的支持态度与其对退休时点的选择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越支持弹性退休政策的居民也更愿意延后实际退休和社保养老金待遇领取的年龄。在完全不支持弹性退休政策的受访者中，超过 80% 的受访者都更愿意提前退休；而在完全支持该政策的受访者中，这一比例降至 24.5%，更大部分的受访者倾向按时退休（38.4%）或者延后退休（26.9%）。这也说明，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行取得良好成效的关键在于获得广大居民的支持。下面将针对受访者的个人特征，更加具体地分析哪些因素会影响居民对延迟退休政策的支持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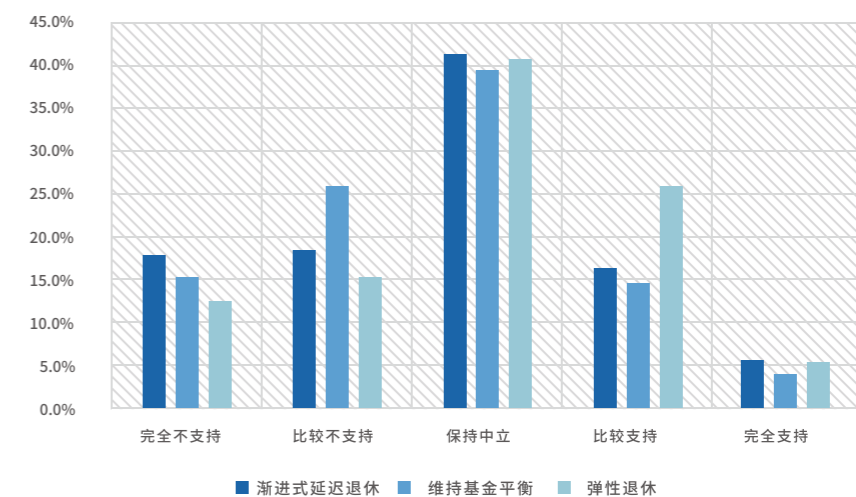


图 6.1 受访者对于延迟退休政策的支持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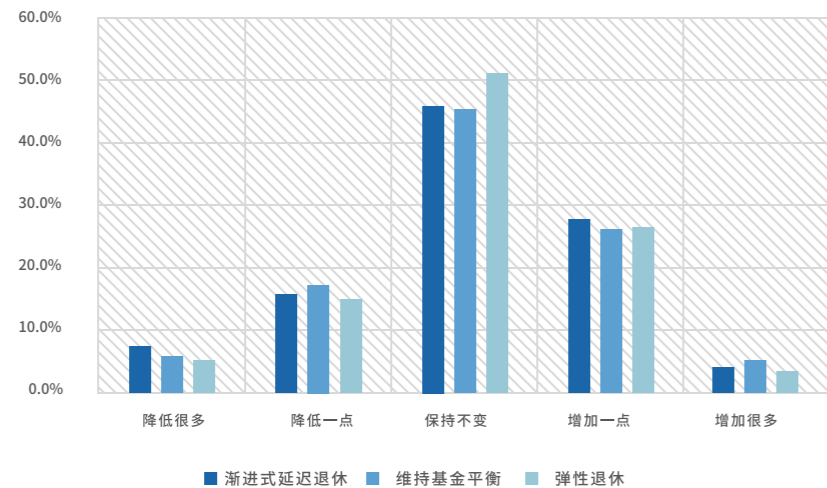


图 6.2 受访者在延迟退休政策下是否会改变退休储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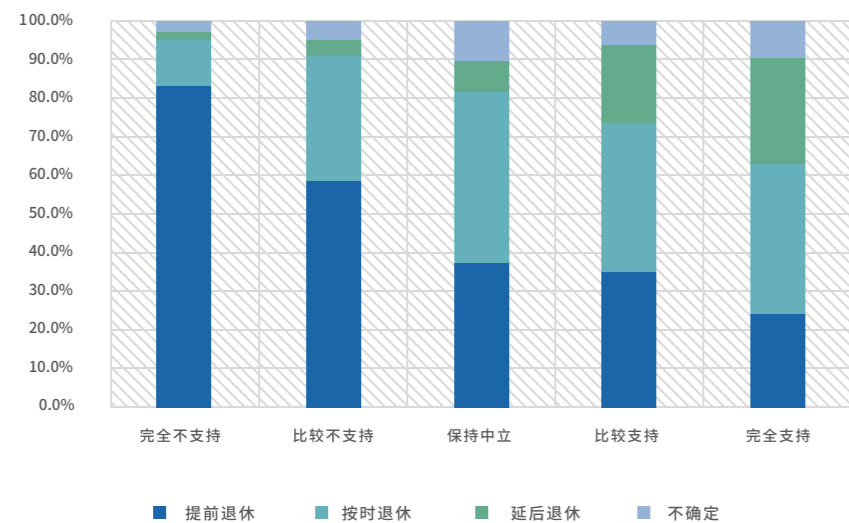


图 6.3 受访者在弹性退休政策下对退休时点的选择倾向



### 6.2.2 工作类型、健康水平等是影响居民延迟退休意愿的主要因素

为了探究影响居民对延迟退休政策态度以及退休储蓄意愿的因素，我们将受访者对三种可能方案的支持程度、改变退休储蓄水平的倾向作为被解释变量，用数值 1-5 分别表示态度从完全不支持到完全支持、倾向降低很多到倾向增加很多；我们将受访者的年龄、性别、退休状态、受雇单位、婚姻状况、生育状况、学历水平、自评健康水平、收入水平和家庭资产水平等作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并添加省份固定效应进行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表明，在受访者的个体异质性特征中，受雇单位、学历水平、个人收入水平、家庭资产水平以及自评健康水平对受访者对延迟退休政策的态度及退休储蓄意愿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年龄、性别、退休状态、婚姻与生育状况等因素导致的差异则并不明显。具体而言：

**身体健康水平与心理健康水平是影响个体对延迟退休政策态度的关键因素，自评健康水平越高的受访者，对延迟退休政策的支持态度越强。**个体对延迟退休政策的支持态度本质上反映了对自身退休年龄和理想退休生活的理性预期。自评健康水平更高的受访者，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允许他们工作更长的年限；由于预期寿命更长，为了应对长寿风险带来的养老财务压力，他们也需要在退休前付出更多的劳动来积累退休储蓄。值得注意的是，通常我们更多关心居民的身体健康水平，而忽视了心理健康对个体退休准备的影响。我们的结论说明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对个体退休生活的预期同样重要，回归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因此，在社会层面上营造良好、积极的退休准备氛围，有助于提高居民对退休生活的信心，从而也更加支持延迟退休政策。此外，由于自评健康水平并不一定能反映个体真实的健康水平，因此对自我健康水平评价较高的受访者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乐观倾向。

**在受雇单位类型方面，体制内工作的居民更支持延迟退休政策。**在三种政策方案下，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等体制内单位工作的受访者对延迟退休政策的支持态度显著地高于其余受访者。在我国，体制内工作通常具有稳定、高福利的特点。在经过一定的工作年限后，这部分群体凭借着工作经验更多从事管理、指导性的工作，在延迟退休的几年内工作量并不会出现明显提升，反而能通过脑力劳动获取更多的收入用于退休准备，因此，体制内工作者更加支持延迟退休。

**在学历水平方面，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居民更支持弹性退休政策，同时也更反对维持基金平衡、降低待遇水平的退休政策。**然而，在弹性退休政策下，超过 50% 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受访者都更倾向早于法定退休年龄退休，这说明高学历居民总体上并不愿意延迟退休。究其原因，教育有助于个体积累人力资本，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居民通常具有更强的工作能力，也因此获得更高的收入回报，我们的数据也显示受访者的学历水平与个人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然而，回归结果表面学历水平与个人收入对居民政策态度的影响具有相反的效应。因此，更可能存在教育带来的非收入因素导致这部分群体的延迟退休意愿较低。比如，我们发现高学历的受访者更期待在退休后能够“发展新的兴趣爱好”、“各地旅行”、“拥有充分的社交生活”，而收入水平对此的影响则并不明显。此外，尽管高学历居民总体上延迟退休意愿较低，但在三种政策方案下他们都更倾向于增加自己的退休储蓄。这也说明，**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居民更容易建立和提升个人的退休储蓄责任意识。**面对长寿风险带来的养老金压力，他们更愿意自觉地增加退休储蓄、灵活地选择退休时间，使自身能够实现充分的退休准备。

最后，我们发现收入与资产对于居民对延迟退休政策的态度具有相反的影响，**个人收入越**

**高的受访者更倾向于支持延迟退休政策，而家庭资产水平越高的受访者则更倾向于反对延迟退休政策。**这两种相反的效应本质上并不矛盾。高收入群体对延迟退休具有较高的支持态度可能存在多方面的原因，比如继续工作能够获得更多的工资收入、积累更多的财富；也可能源于他们本身对工作的热情，对事业的热爱为他们带来了较高的收入，也使得他们不愿意过早退休。而资产水平较高的群体已经拥有足够的退休储蓄，可以通过金融投资、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从而获得稳定的养老金收入来源。因此，他们并不需要通过延迟退休来获得足够的退休储蓄，也不担心长寿风险带来的财务压力。此外，家庭资产水平越高的受访者在延迟退休的政策背景下也更愿意提升退休储蓄水平，而收入水平对此的影响则并不显著，这也体现了资产与收入水平对个人退休准备影响的差异。

### 6.3 中国居民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态度

上世纪末期，世界银行关注到了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老龄化趋势，对很多国家的退休收入体系和制度改革模式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在 1994 年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三支柱”退休收入保障体系，如今也被更多地称为“三支柱”养老金体系，其本质是由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承担养老责任。当前，中国也在积极建立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第一支柱是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是指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尽管在国内起步和正式确立时间较晚，但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也得到了迅速地发展；在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补充养老保险金之外，由个人自行缴费、承担的商业养老保险产品或者以养老为目的的储蓄、投资计划构成了养老金体系的“第三支柱”，即个人养老金。

建设“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不仅有利于补充对非正规部门人群的养老保障，比如家庭妇女、灵活就业人员等，也能帮助高收入、高净值群体进行更专业、充分的退休准备，在退休后实现更高的养老金替代率水平。因此，发展个人养老金对于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国务院在 1995 年的通知中便提出鼓励建立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但经历了长期的探索和各部门间的协调，直至 2018 年财政部等五部委才发布了《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在国内开始试点；2022 年 4 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标志着具有政府税收优惠支持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在国内正式成立。

具体而言，所有参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都可以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个人养老金实行个人账户制度，缴费完全由参加人个人承担，实行完全积累。参加人通过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个人退休账户享受国家制定的税收优惠制度，其中的养老金可以在符合规定的金融机构或销售渠道购买金融产品，在退休前不得提前支取。

在社会老龄化程度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促进“三支柱”养老金的协调发展便十分重要。在我国当前的养老金资产结构中，“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占据了绝大部分，而“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由于才开始发展，占总资产的比重几乎为零。随着人口出生率降低、老年抚养比不断攀升，未来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平衡将面临巨大压力，“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将成为居民退休收入的重要来源。然而，由于个人养老金制度并非强制参与，不少居民对于该制度可能缺乏了解，也低估了其重要程度。因此，在本次调研中，我们询问了受访者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的认知情况及支持态度，希望为如何引导居民积极参与、如何完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提供可行的建议。

#### 6.3.1 居民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缺乏了解，但普遍支持

首先，我们询问了受访者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的了解情况。**总体而言，中国居民目前对“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还十分缺乏了解。**如图 6.4 所示，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对该制度了解一般或是缺乏了解，仅有 20% 的受访者对其具有一定的了解，这说明该制度推出至今时间较短，在社会层面的宣传和影响力度还十分有限，居民对该制度的认识还有待加强。这一定程度影响了“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在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中的作用。

其次，我们询问了受访者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支持态度，结果表明，**绝大多数的中国居民对“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都持有支持态度**，仅有 10.7% 的受访者表示不支持。这说明，尽管大部分居民对个人养老金制度尚且缺乏了解，但他们大多都不反对该制度的正式落地。这可能是由于该制度并不会对居民造成负面影响，同时具有非强制性，居民个体具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条件决定是否参与个人养老金。此外，**居民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了解程度与支持态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对该制度越了解的受访者总体上也更加支持。**如图 6.5 所示，在完全不了解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受访者中，仅有 23.6% 的受访者对该制度表示支持；然而，对于完全了解该制度的受访者，其中 89.8% 的受访者都对该制度表示支持。这也说明，加强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普及、宣传，将极大地提升居民对政策的了解程度和支持力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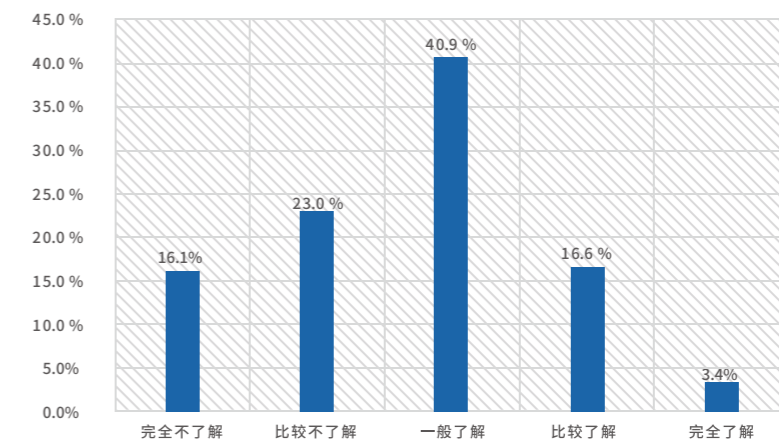


图 6.4 受访者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的了解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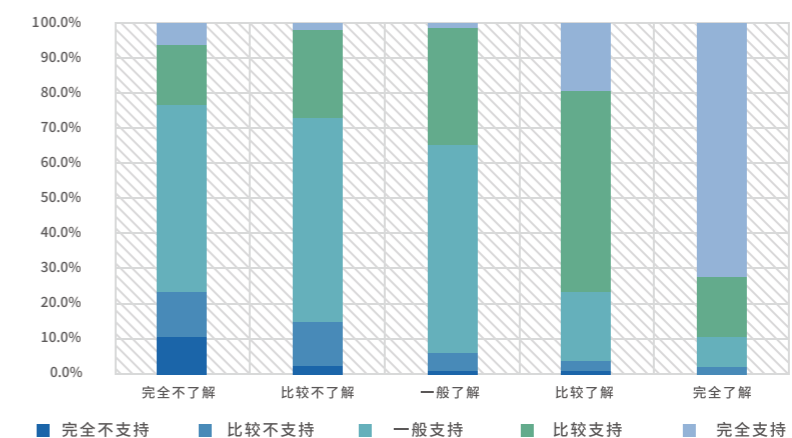


图 6.5 受访者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支持态度

个人养老金制度实行个人账户制度，账户中的养老金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而现行制度规定参加人每年缴纳个人养老金的上限为 12000 元，未来也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发展情况等因素适时调整缴费上限。我们关心当前的个人账户优惠力度对于我国居民是否具有吸引力，以及在无缴费上限的情况下，居民理想的个人养老金缴费需求。结果表明，**当前缴费上限下的优惠力度对于我国居民具有一定的吸引力**，51.9% 的受访者认为一般吸引，29.1% 的受访者认为比较吸引。同时，**对个人养老金制度越了解的居民，认为其优惠力度对自身的吸引力更强**。如图 6.6 所示，在完全不了解的受访者中，仅有 21.9% 的受访者认为比较吸引或完全吸引，而这一比例在完全了解的受访者中则上升至 75.9%。当我们询问受访者“如果没有缴费上限，您愿意将自身收入的多大比例用于缴纳个人养老金”时，受访者回答比例的均值为 26.8%，如图 6.7 所示，其中 42.4% 的受访者理想的缴费比例约为个人收入的 20%-40%，而 24.9% 的受访者这一比例超过了 40%。结合受访者的个人收入统计数据，从愿意缴纳个人养老金的实际金额来看，如果没有缴费上限，受访者愿意每年缴纳个人养老金的平均数额为 2.4 万元，为现行缴费上限标准的两倍。更具体地，如图 6.8 所示，62.1% 的受访者实际的缴费需求都超过了每年 1.2 万元的现行标准。这一结果说明，**我国居民实际上对个人养老金具有较高的需求，个人退休账户的缴费标准和优惠力度尚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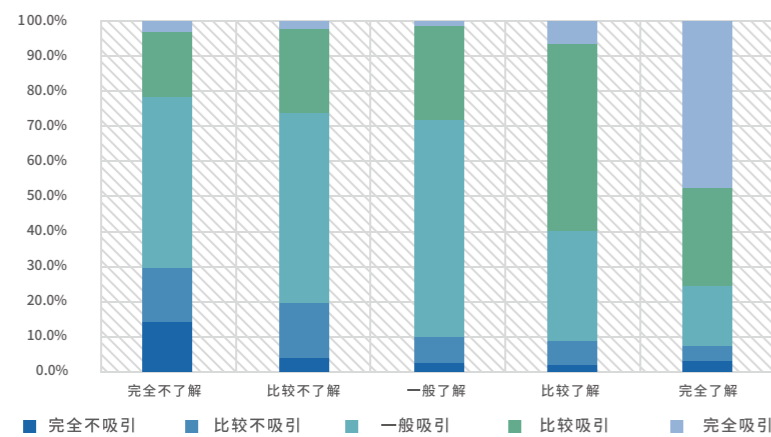


图 6.6 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力度对受访者的吸引力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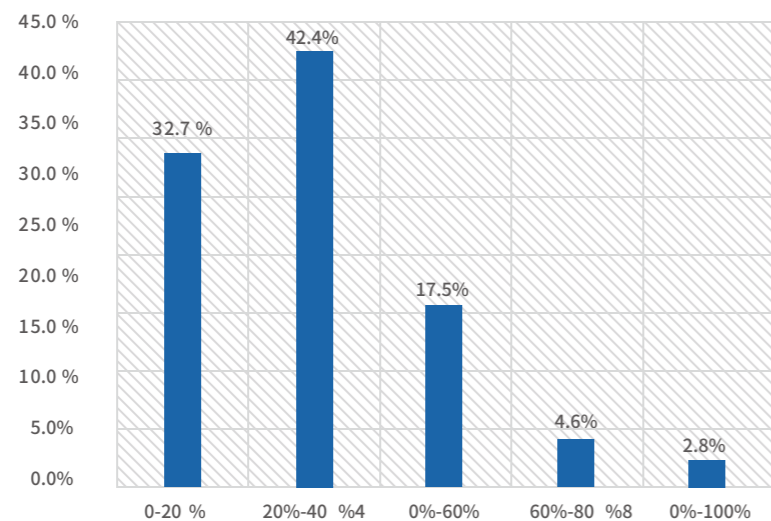


图 6.7 受访者对个人养老金理想的缴费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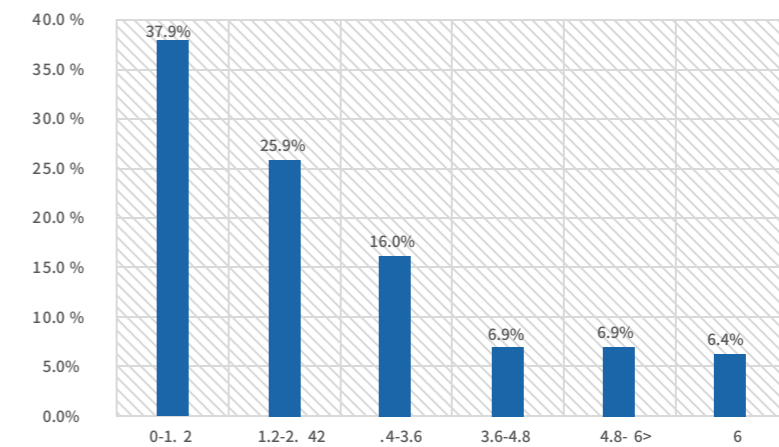


图 6.8 受访者对个人养老金理想的缴费金额

### 6.3.2 我国居民对于年金产品的需求还有待提升

最后，我们关心居民对于个人养老金的领取方式。现行制度规定，我国居民在达到基本养老金待遇领取年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者出国定居等情形下，可以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地领取个人养老金。而“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作为居民退休收入的重要补充成分，按月、分次地领取账户资金将更有助于个体应对老龄化时代的长寿风险挑战，实现生命周期效用的最大化。如图 6.9 所示，有 40.7% 的受访者愿意以年金化的方式在退休后领取个人养老金，尽管这一比例高于其他选项，但距离社会总体理想的比例还十分不足，**我国居民对年金产品的需求还有待提升**。此外，有 16.6% 的受访者愿意一次性全部提取个人养老金，而有 24.3% 的受访者倾向于在退休后 3-5 年分次地将账户资金全部提取，这种领取方式主要出于避税的目的，并非真正存在对分次领取的需求，因此属于隐性一次性领取现象。

在此基础上，我们希望更细致地检验居民个体做出个人养老金领取决策时存在的异质性差异。将受访者的个体特征作为解释变量，其是否选择年金化领取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其中，若受访者选择一次性领取或者在 3-5 年内分次领取，则被解释变量为 0，若选择年金化领取或者部分年金化领取，则被解释变量为 1。回归结果显示，受访者的金融素养水平与其年金化领取个人养老金的概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金融素养越高的居民越倾向于年金化领取**。这是因为金融素养较高的居民更容易意识到长寿风险及其带来的养老财务挑战，从而更加明白年金产品的价值。我们还发现，受访者的年金领取决策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年金化领取个人养老金的概率低于女性**。一方面，我国男性职工的退休年龄晚于女性，开始领取养老金的时间更晚，而我国男性的平均寿命略低于女性，因此男性在退休后以年金化方式领取养老金的期限更短，由于损失厌恶，男性可能高估自身的早逝风险，因此低估年金产品的价值。另一方面，在金融投资中男性往往更容易存在过度自信倾向，高估了自己的投资理财能力，从而更愿意将个人养老金一次性取出由自己进行管理。因此，为了更好发挥个人养老金作为“第三支柱”应对长寿风险、实现收入保障的功能，我们应当普及、宣传与人口老龄化相关的金融知识，提高居民的金融素养，鼓励我国居民尤其是男性居民采取年金化的方式领取个人养老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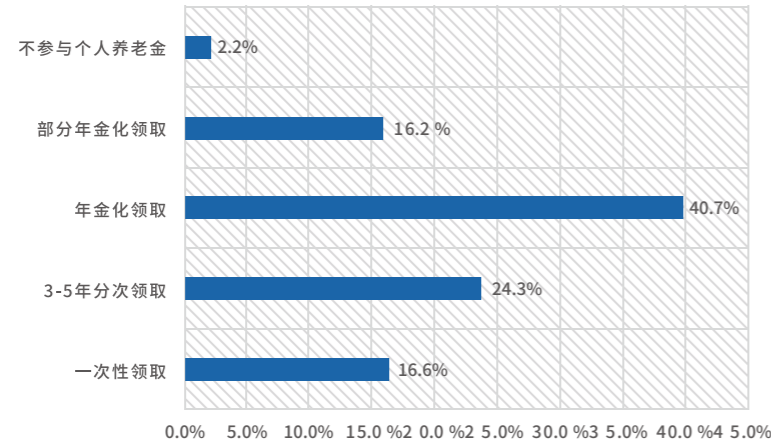


图 6.9 受访者倾向领取个人养老金的方式

## 6.4 对青年群体的特别分析

在本次调研中，我们特别关注了年龄在 18-35 岁的青年群体，他们正值事业上升的黄金时期，且受到 20 世纪末期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他们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如今我国社会进入老龄化的情况下，未来他们将会面临比现在中老年人更加严峻的退休准备问题。我们希望通过青年群体的关注，了解他们的退休生活预期与退休准备情况，针对他们的情况与诉求给出相应的总结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 6.4.1 青年群体的退休生活预期

**在询问青年群体对于自己未来预期退休年龄的看法时，多数青年受访者对预期退休年龄比较乐观。**超过六成的人认为自己将在 55-60 岁退休，有接近两成的人认为自己能够在 55 岁之前提前退休，认为自己将在 66 岁及以上退休的人只占青年受访者群体的 2.80%。绝大多数青年群体认为自己退休年龄不会超过 65 岁，这意味着他们认为即使实施延迟退休政策，也会有限度地实施，并且说明大多数青年群体对于退休年龄有基本的认知。值得关注的是，不少年轻人持有提前退休的信念，对于自己能够提前退休充满信心，他们对自己的未来生活有着相对积极的态度。

**对于退休后的预期余寿，青年群体的答案则差异很大。**有超过四成的年轻人认为自己的退休后预期余寿超过 20 年，这与不少年轻人拥有着提前退休的观点相印证，同时还有超过两成的青年受访者认为自己的退休后预期余寿不会超过 15 年。总体而言，与现在的中老年人这一代相比，如今的青年群体不少人都认为自己将有机会享受到更长时间的退休后生活，甚至还有部分人坚信自己会提前退休，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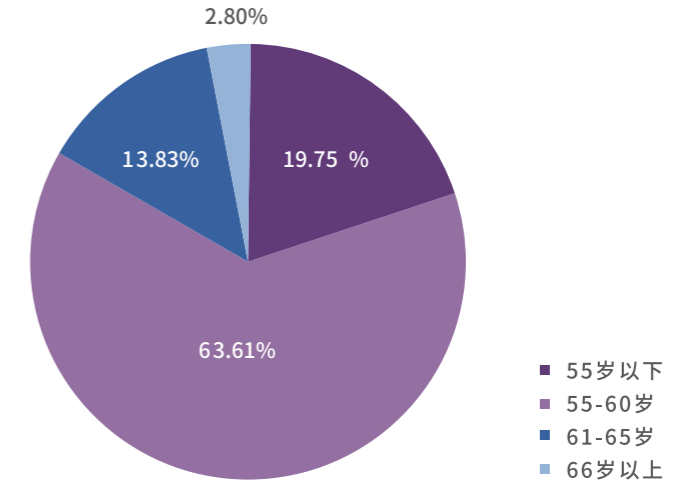


图 6.10 青年群体的预期退休年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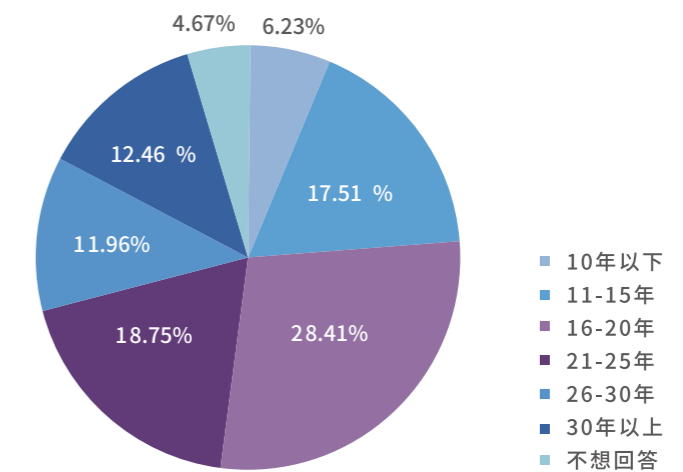


图 6.11 青年群体的预期退休后余寿



**青年群体期待的养老方式还是以社区居家养老和传统家庭养老为主。**青年群体对于养老方式没有明显的转变。超过七成的青年群体对于养老方式还是习惯于在家居住生活，由子女进行照顾和陪伴或由政府和社区提供必要的上门或托老服务，少部分群体开始关注到商业养老机构提供的家庭护理服务，并且认为该项服务或许是较好的退休养老方式，只有约 15% 的青年受访者群体认为居住在养老院或养老中心是更好的养老方式。这说明青年群体大多数对退休后离开家居生活仍然心怀顾虑，不愿接受在养老院或养老中心度过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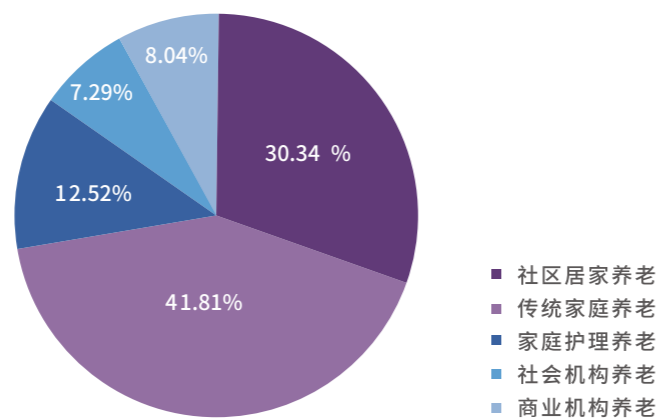


图 6.12 青年群体期待的养老方式



青年群体预计在退休后最为担忧的问题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失去独立生活能力”、“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和“无力支付医疗、护理费用等巨额支出”。**总体来说，青年群体最为担忧的还是自己的身体健康问题，其次则是心理健康问题。**对于个人未来的退休生活，青年群体一方面期待拥有更为优质的医疗服务，同时对自己退休后的健康状况又充满担忧，并且很多青年群体都已经认识到自己退休后可能面临健康状况不佳需要高额的医疗与护理服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退休后的高额医疗与护理支出，在风险意识逐渐提高的过程中，这意味着将有更多的年轻人将有机会寻找适合的医疗与护理相关的保险，保险公司应当积极开发与设计相应的保险产品以满足青年群体商业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的需求。除此以外，心理健康问题成为了青年人较为担忧的问题，由于工作、养老以及育儿的压力的存在，青年人正在面对更重的心理压力，在关心身体健康状况的同时还应当格外关注心理健康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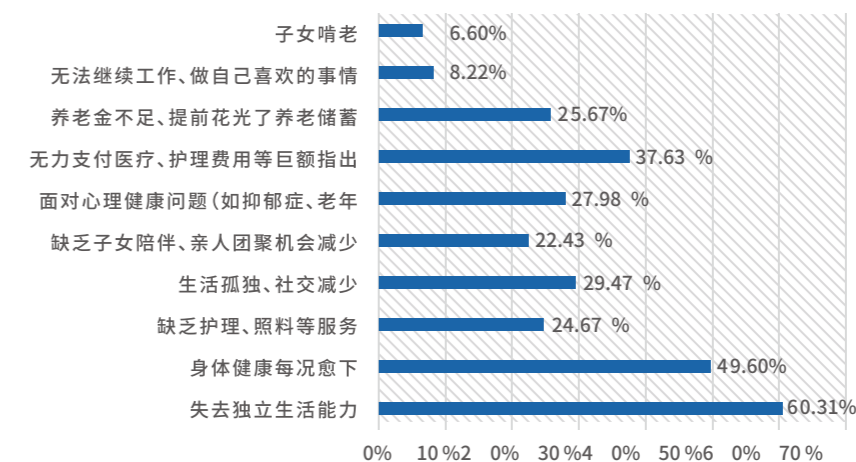


图 6.13 青年群体对退休生活担忧的因素

#### 6.4.2 青年群体对社会生育现状的看法

随着居民预期寿命的延长与生育率水平的持续下降，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未来数十年将面临劳动力短缺与国家养老财政压力过大的问题。2021 年 5 月，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结果发布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对我国的生育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由 2015 年开始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转变为将实施三孩政策。2021 年 8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宣告了我国三孩时代正式来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少数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夫妻双方户籍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关于再生育子女的规定不一致的，按照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适用。”

为了了解青年群体对社会生育现状的看法，以及他们对自身生育决策的考量，我们询问了受访者认为的生育孩子最主要的目的和导致年轻人生育意愿低下的原因。

**对于导致年轻人不愿意生育的原因，青年群体普遍认为主要是“生养孩子的经济成本太高”和“子女教育的经济成本太高”。**其次还有部分受访者认为“养育孩子很费力，没有时间照顾孩子”，

同时“担心影响工作升迁和事业发展”。现在的青年群体往往追求较高质量的生活，而如今生养孩子和子女教育的经济成本是年轻人担忧的主要因素，部分青年人秉持宁可做高质量的丁克家庭，也不愿意选择养育子女，主要的原因是如果养育子女，父母都倾向于为其提供较好的生活条件，如此势必影响家庭的生活水平与质量。除此以外，对于年轻女性来讲，她们不愿意生育的额外的原因集中在担心影响工作和事业发展，如果想要提高我国的生育率，还应当从政策层面消除工作中的性别与生育歧视，为年轻女性的事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的条件与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年轻人不愿意生育的主要原因并非“不喜欢小孩”、“家里没有老人照顾孩子”、“可以选择新的养老方式，不再需要养儿防老”，这说明**年轻人并不是真的不愿意生小孩，也不是出于养老的考量，而是因为生育的成本过高，以至于导致生育可能大幅度降低家庭的生活质量**。因此，想要提高我国的生育率水平，应当努力为年轻人创造更多更好的在生育福利和横向公平方面的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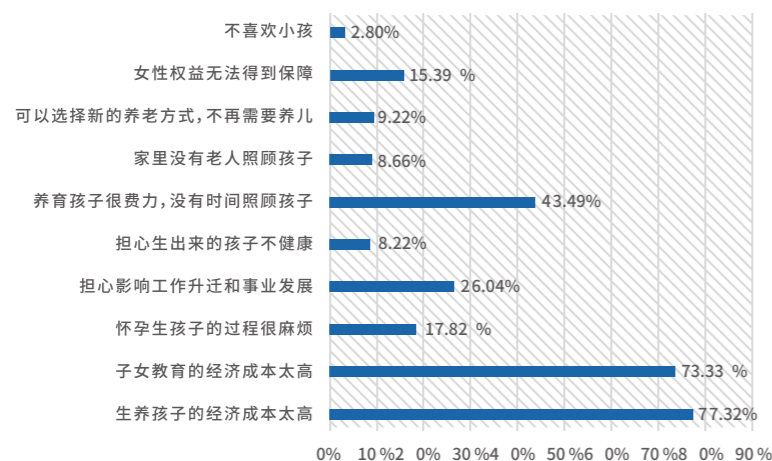


图 6.14 青年群体认为导致社会生育意愿低下的原因

**青年群体对于生育孩子的目的的看法则较为多样。**青年群体认为生育孩子最主要的三个目的分别是“喜爱孩子，体验做父母的乐趣”、“养儿防老，在退休后能获得子女照顾”和“传宗接代，延续血脉”。仅次于以上三点，还有部分青年群体认为生育孩子没有特殊的目的性，是自然的人类行为。除此以外，还有少部分人认为生育孩子的目的是“维系和加强夫妻感情”、“响应国家号召，为社会做贡献”和“增加劳动力，减轻家庭工作和收入负担”，说明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已经成为了部分年轻人生育的原因，并且还有部分年轻人已经意识到生育对于夫妻感情和增加家庭收入的作用，部分年轻人已经具备了生育的责任意识，同时意识到了生育对家庭收入和养老方面的重要作用。

**总结来说，年轻人并不在观念上排斥生育子女，而是社会为年轻人创造的有利的生育条件不足。**目前已有部分年轻人能够有一定的生育责任意识，并且客观上从养老以及传宗接代的观念的角度认为是有必要生育子女的，但是不愿意生育的主要原因还是集中在生养孩子和子女教育的经济成本太高，包括怀孕期间支出的费用、子女出生后的衣食住行、从小学到高中的 12 年教育过程中支出的学费等。生育孩子实际上是承担了一部分的社会责任，生育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增添了劳动力，保证了国家经济与社会秩序的正常发展，是具有正外部性的活动。为此，从政策层面上我们应当为适龄青年创造良好的生育条件，包括生育补贴、子女教育补贴、子女生

生活补贴和税收优惠等，为愿意生育的适龄青年减轻经济方面的压力，从而帮助愿意生育的夫妻扫除障碍，提高社会总体的生育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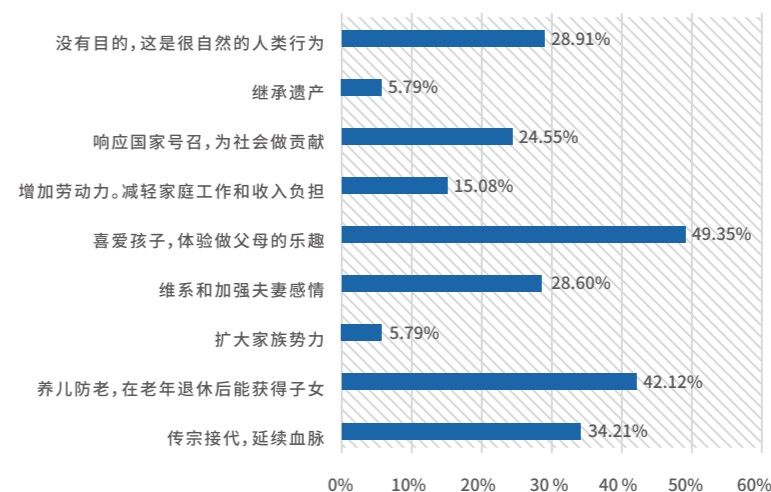


图 6.15 青年群体认为生育孩子最主要的目的



### 6.4.3 针对青年群体的建议

基于以上对青年群体退休生活愿景和社会生育现状的看法的分析，我们对青年人在退休准备和生育方面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青年人应该更加关注自身的职业发展，做好自己的计划与资产配置，有针对性地配置一些商业健康保险，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退休后的健康问题。**在现阶段，青年人尚处在职业发展与个人发展的黄金阶段，应该及早地有意识地对工作及退休后的生活进行合理地计划。青年群体大多还是更加倾向于生活在家中的养老模式，为应对该养老模式可能面对的生活不能自理的失能风险以及因子女忙碌而无人照料的问题，应该及早进行储蓄和资产配置，实现资产的增值和个人抗风险的能力，从而实现自己预期的退休生活愿景。

**其次，青年人应当多关注自身的身体与心理健康问题，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工作与生活，必要的时候可以向医生或社会组织寻求帮助。**由于如今的青年群体大多是独生子女，未来将会面临巨大的赡养老人与养育子女的双重压力，青年群体也更多地关注和担忧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问题。保持良好的身体与心理健康状态有助于个人更好地发展和降低身心健康问题带来的医疗支出。

**最后，青年人应当认识到国家面临的养老与财政压力，提高生育责任意识，并且利用好国家和社会为适龄青年创造的良好生育条件。**通过调查发现，青年人大多能够清晰地认识到生育带来的经济压力，但是对于国家未来可能面临的养老财政压力没有清晰的认识，没有充足的生育责任意识。国家已经开始陆续出台鼓励生育的配套政策，愿意生育的青年人应当响应国家号召积极生育，享受国家创造的生育福利政策，同时相信国家和社会必将为我们的子女创造更为优质的成长条件与环境，将能够通过相应的政策促进横向公平，保障有孩和多孩家庭的生活质量。



## 6.5 新冠疫情对居民退休准备的影响

### 6.5.1 总体上疫情降低了居民工作收入，增加了收入波动性

首先我们关注于居民就业是否受到疫情的影响。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有 42% 的受访者表示疫情导致自己工作曾经中断过，但并没有失业；有 15% 的受访者经历了失业并重新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还有 2% 的受访者目前仍然失业。由此可见疫情对居民的就业情况产生了非常广泛的负面冲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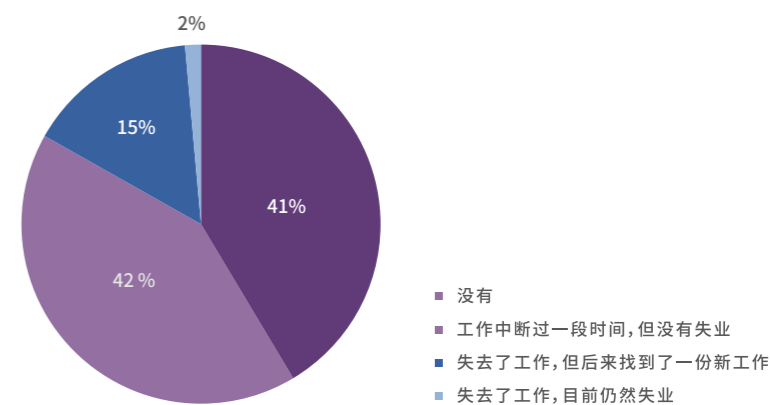


图 6.16 就业状况是否受到疫情影响

除了造成部分居民失业之外，新冠疫情也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收入水平。如图 6.17 和图 6.18 所示，有 56% 的未退休居民和 51% 的已退休居民表示自己的收入水平由于疫情而降低，有 62% 的未退休居民和 57% 的已退休居民表示自己的收入水平变得更容易波动。不难发现疫情对未退休居民的收入水平的影响更大，这是因为退休居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退休金和养老保险产品，收入现金流较为稳定，抗风险能力更强。而未退休居民的收入更依赖于工资收入，而疫情对很多服务业、制造业企业造成了巨大影响，进而影响了这些企业员工的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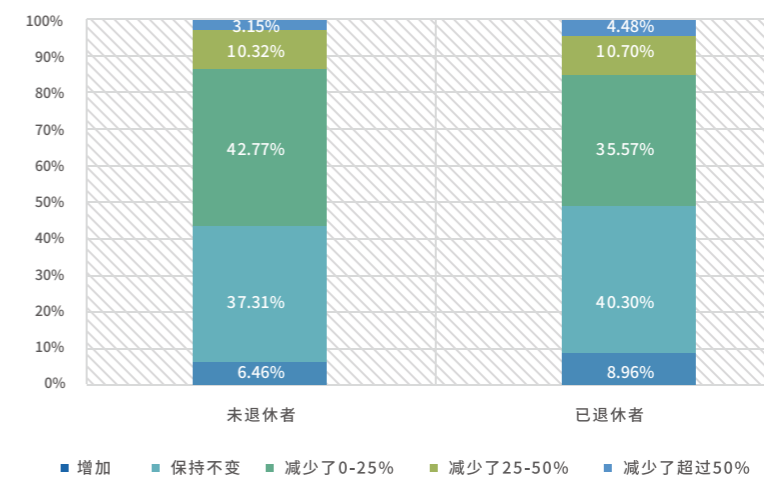


图 6.17 疫情对受访者收入水平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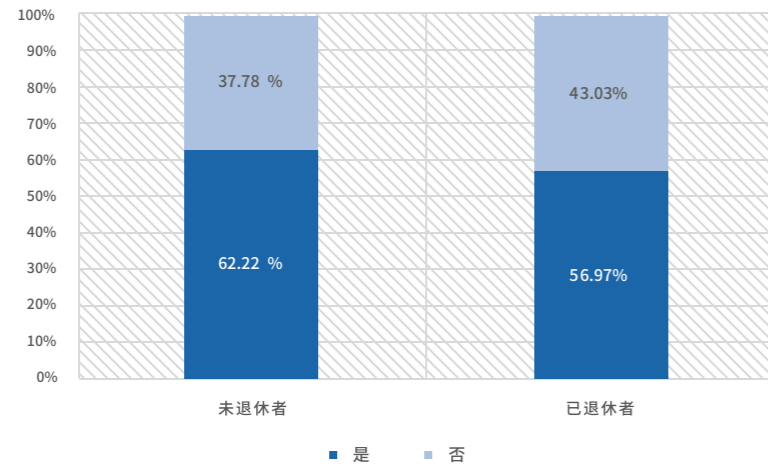


图 6.18 受访者收入是否变得更容易波动

### 6.5.2 多数人选择减少日常开支，并且提前取出退休储蓄

前面的调研展现了新冠疫情对居民收入的影响，我们接下来进一步研究居民如何应对收入下降和收入波动的风险。根据调查结果，绝大多数居民选择了减少日常开支，占比超过 60%，远超其他方式。此外还有 24% 的居民选择动用储蓄账户，18% 的人选择从退休储蓄账户中取款，17% 的人选择减少或停止向退休账户供款。不断反复的疫情使得居民不得不将自己的养老金储蓄提前用于消费，对未来养老生活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同时也会间接影响整个养老金融行业的景气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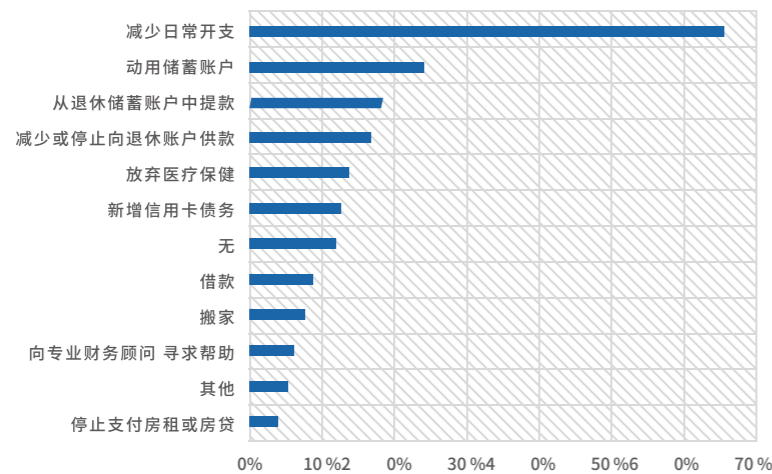


图 6.19 受访者应对收入下降风险的方式

### 6.5.3 总体上对舒适退休生活仍保有信心

调查结果显示，虽然疫情给人们的收入和生活都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总体上居民对退休生活信心程度保持中性偏乐观，40% 的受访者对退休生活有信心，42% 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信心一般，仅 17% 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对于退休生活没有信心。但具体谈及疫情的影响时，居民的信心程度还是较为悲观，有 47% 的居民认为疫情降低了自己对未来退休生活的信心，仅 13% 的居民认为疫情增加了自己对未来退休生活的信心水平。

由于人们相信疫情的影响是暂时的，因此被问及对下一代人退休生活的预期时，大多数受访者还是给出了较为乐观的回答。结果显示有 44% 的受访者对下一代的退休生活有信心，比对自己退休生活有信心的受访者数量多 4%；有 36% 的受访者对下一代的退休生活信心一般，有 20% 的受访者对下一代人的退休生活没有信心。

退休信心水平	总体 (%)	疫情导致信心变化 (%)	对下一代人退休生活的预期 (%)
完全没有信心	5%	10%	7%
比较没有信心	12%	37%	13%
信心一般	42%	40%	36%
比较有信心	34%	9%	33%
完全有信心	7%	4%	11%

图 6.20 疫情后受访者的退休信心水平





## 07. 结论与建议

### 7.1 政府可发挥的作用

我国目前正面临着日渐严重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人口老龄化不仅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也给居民的养老财务准备带来巨大挑战。因此，在人口老龄化时代，政府应当在缓解社会抚养压力、完善退休收入保障体系、创造良好的养老生活环境等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

**首先，政府可以通过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面，引导居民正确认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改善居民的退休生活预期，防止人们出现过度乐观或悲观的预期。**在应对养老金缺口问题上，政府应当建立养老金保障机制，优化社保基金的投资组合，从而提高居民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信心。在延迟退休政策方面，由于单一退休时间点的规定难以满足所有人意愿，一刀切的改革可能受到较大的社会阻力。因此，政府应适时推出渐进式的延迟退休政策，具有一定弹性的政策更受居民的欢迎。在缓解生育率下降方面，政府应当确保落实“三孩政策”的相关配套支持措施，真正降低青年人的生育成本，保障妇女生育和就业的权利，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从根本上提升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

**其次，在鼓励居民个人做好退休准备方面，政府应当完善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促进“三支柱”养老金的协调发展。**当前，我国养老金体系最大的问题表现为资金积累规模较小、资产结构严重失衡，原因在于第二、三支柱的起步时间较晚、发展缓慢。因此，在未来应当重视对第二、三支柱的建设，鼓励企业和居民个体承担更多的退休收入责任。在今年，以个人退休账户为基础、享受税收优惠的个人养老金制度正式落地。在做好发展第三支柱顶层设计的同时，政府应当加强社会层面对该制度的普及、宣传，从而提升居民对个人养老金的了解与支持程度。此外，在养老金领取时，政府应当鼓励居民以年金化的方式领取，从而更好地发挥第二、三支柱作为补充养老保险应对长寿风险、实现收入保障的功能。

**最后，在帮助个人作好退休规划方面，政府应当加强社会金融素养教育，对居民的退休规划加以引导。**较高的金融素养水平不仅能促进居民个体利用科学、专业的手段进行投资理财，也能提升居民的退休责任意识从而开展更充分的退休准备。在我国，居民对于来自政府的财务规划建议具有较高的信任程度，因此，政府也更应当对居民的退休准备行为加以积极、正确的引导，帮助居民履行个人的退休养老责任。

### 7.2 企业应做出的改善

目前我国企业对于居民提供的退休保障往往集中于财务层面，最常见的退休保障是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保。本次调研当中，未退休居民表现出了较为强烈的对于退休后财务问题的关注和退休储蓄的意识。**为了更好的满足居民财务规划的需求，企业可以通过拓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等计划为员工提供退休后的经济保障，丰富员工的退休理财选择。**针对于我国居民金融素养的缺失，雇主可以提供更加多样化的财务帮助，比如组织个人理财储蓄培训，提升员工退休责任意识，聘请专业理财机构为员工提供理财建议和管理服务等。

居民在退休生活当中遇到的最大痛点往往来自身体健康层面。居民们普遍担心自己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后随之而来的医疗费用、照料看护和陪伴问题。**雇主应当提高对于员工的身心健康的关注程度**，可以通过组织定期体检、号召员工进行体育锻炼、聘请专业人士提供健身指导、健康知识普及等方式提高员工的健康水平，并在日常要注意为员工提供环保、舒适的工作环境。同时，企业不能忽视员工的心理健康状况，对于一些工作压力大的岗位，企业应当提供心理咨询和治疗服务。针对我国居民普遍担心的退休后医疗费用开支，企业可以考虑通过为员工提供人身健康保险的方式，为员工退休后可能遇到的健康问题提供财务保障。

对于中青年员工，企业可以为他们提供相关的专业技能培训，帮助其保持并发展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对于女性员工，企业更应以平等、尊重的态度，保障妇女生育和就业的权利，支持国家生育政策的推行。

针对国家可能推出的延迟退休政策，**企业和单位应积极响应政府号召，鼓励员工适当延迟退休时间，帮助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同时，鉴于我国居民没有形成延迟退休的普遍预期，在我国延迟退休政策即将落地的大背景下，雇主应承担起作为联通社会需要和居民意愿的纽带责任，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来调和居民退休预期与社会延迟退休政策之间的差距。具体而言，**企业应该在执行国家政策的基础上，为员工提供灵活的退休选项**，这也是我国居民对于企业退休支持的众多选项中呼声最高的诉求。

### 7.3 个人应做出的努力

居民个人应在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政府政策、家庭条件、个人经济与健康状况等因素的基础上，更加理性地认识退休计划、退休储蓄、资产配置的重要性，以保证自己在退休后能够有令自己满意的退休收入。对青年群体来说，他们还处在职业发展的上升阶段，应该及早地进行工作与生活规划，脚踏实地稳步发展，为自我提升发展不懈努力。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保持身心健康，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不吝嗇于为他人提供帮助，也不羞于向他人寻求帮助。

**在退休准备方面，个人应理性预期未来的经济发展形势，对个人发展制定切实有效的计划，避免过于乐观或悲观的情绪**。同时，个人应注意提高个人金融素养水平和退休准备责任意识，积极制定个人退休准备计划，养成定期储蓄的好习惯，减少个人不必要的开支，理性地进行投资，合理地选择适合自己的金融产品。同时青年群体应当关注政府退休政策的变化，以便对个人的退休计划做出积极的调整。为应对退休后对健康状况的担忧，一方面，个人应该努力提高自身身体素质，加强体育锻炼，注重劳逸结合，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另一方面，个人还应该配置一些商业健康保险，以应对失能、大病等健康风险造成的巨额医疗支出对个人退休生活水平带来的风险。

**在退休规划方面，个人应不断提高对财务规划问题的认识理解能力**。个人应该结合我国“三支柱”养老金体系目前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确定个人建立第三支柱养老金的策略选择。在建立个人养老金的过程中，应注意资产的多元化配置，风险与收益相匹配，适当购买一些商业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积极关注养老目标基金等。

**在面对生育问题方面，青年群体应当认识到国家面临的养老与财政压力，提高生育责任意识，**

**并且利用好国家和社会为适龄青年创造良好的生育条件**。社会其他群体以及不愿生育的青年群体应当积极为愿意生育的适龄青年提供良好的生育条件，认识到有孩或多孩家庭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面临的经济压力，积极促进适龄青年男女的生育意愿。从而保障愿意生育的青年人能够响应国家号召积极生育，享受国家创造的生育福利政策。同时青年人应该相信国家和社会必将为我们的子女创造更为优质的成长条件与环境，将能够通过相应的政策促进横向公平，保障有孩和多孩家庭的生活质量。

### 7.4 保险可作为的领域

在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大背景下，挑战和机遇并存。根据智库布鲁斯学会的一项研究，老年人现在是经济中的重要参与者，2015年欧洲老年人共同拥有3.7万亿欧元的资产，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银发经济市场。而在中国，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迅速扩大，对优质养老金融产品的需求也在持续扩大。作为养老金融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保险机构在帮助居民作好退休财务准备方面理应发挥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保险公司应根据养老保障的需要，积极创新养老年金产品**。（1）开发契合养老需求的保额可变的寿险类产品，被保险人在退休前可以获得较高身故保障，退休后则适当降低身故保障，可将保单的部分现金价值提取出来为老年生活所用。（2）开发可提供紧急流动性的养老年金产品，当被保险人有紧急流动性需求时，如得了大病需要医疗费用时可以获得保险给付。（3）积极开发与企业/职业年金对接的养老年金产品，当职工退休时将其在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个人账户中的资金以趸交保费的方式转为养老年金保险，使得职工退休后终身拥有稳定的收入。（4）开发嵌入长期护理保障的养老年金保险产品，在养老年金保险合同中附加约定，如果未来被保险人进入需要护理的状态，可用当期及未来的年金给付支付护理费用。（5）在领取环节的设计上，应尽量鼓励被保险人长期领取。（6）积极探索并加快发展变额年金，体现出养老年金保险在提供长期经济收入保障方面具有的独特优势。

**其次，老龄化的加速使得优质养老服务的需求也在持续扩大**。保险公司需要从单一的“资金保障”模式向“资金保障+服务提供”模式拓展，将“资金保障”与“服务提供”两种功能结合起来，建立并完善“保险+医疗服务”、“保险+健康管理”等模式，解决好老年人最关心的问题。保险行业可以以保险业务为支点，以保险产品衔接上下游养老与健康服务，促进产品开发和养老业务相互融合。

**最后，保险公司应当重视对消费者的宣传教育，积极利用多种渠道和手段，提升消费者对保险的正确认识**。特别要注意在互联网时代，青年群体更频繁地利用网络，具有较强的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财经媒体、短视频、公众号等自媒体正成为未来主力消费群体的选项。因此，通过互联网渠道向消费者普及金融知识，提升居民金融素养和退休责任意识，帮助他们正确了解金融保险产品，认识保险在退休准备中的不可替代作用。

## 08. 附录：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计算方法

为了直观地描述居民的退休准备程度，荷兰全球人寿定义了退休准备指数。将退休准备方面三个态度层面的问题以及三个行动层面的问题作为自变量，将居民为今后退休采取的储蓄方式作为指数因变量，计算退休准备指数。首先将每个问题的选项由准备不充分到充分进行打分，分值分别为 0、2.5、5、7.5、10，然后将自变量问题与因变量问题得分的相关系数作为权重对每个问题的平均得分进行加权，最终得到居民退休准备指数。

为了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邀请了十二位学界和业界的专家为六个维度要素对退休准备程度的影响的权重进行了赋值，结果如下：

表 8.1 十二位专家的赋值结果

变量	专家1	专家2	专家3	专家4	专家5	专家6
退休责任意识	10%	10%	20%	20%	10%	20%
财务规划认知水平	25%	25%	20%	15%	15%	15%
财务问题理解能力	20%	10%	10%	10%	15%	15%
退休计划完善度	20%	20%	20%	20%	10%	15%
退休储蓄充分度	20%	25%	20%	25%	30%	20%
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	5%	10%	10%	5%	20%	1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变量	专家7	专家8	专家9	专家10	专家11	专家12
退休责任意识	10%	30%	5%	20%	20%	20%
财务规划认知水平	20%	20%	20%	10%	20%	20%
财务问题理解能力	20%	10%	20%	10%	10%	15%
退休计划完善度	20%	10%	10%	20%	20%	20%
退休储蓄充分度	20%	20%	40%	20%	20%	15%
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	10%	10%	5%	20%	10%	1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据此我们将十二位专家的结果进行平均，得到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的六个维度的权重：

表 8.2：退休准备指数计算权重

变量	退休责任意识	财务规划认知水平	财务问题理解能力	退休计划完善度	退休储蓄充分度	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
权重	16.25%	18.75%	3.75%	17.50%	22.92%	0.83%

退休准备指数 = 退休责任意识 × 16.25% + 财务规划认知水平 × 18.75% + 财务问题理解能力 × 3.75% + 退休计划完善度 × 17.50% + 退休储蓄充分度 × 22.92% + 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 × 0.83%

退休准备指数结合了三个态度层面问题和三个行动层面问题的回答，适当调整加权后得到了一个衡量总体退休准备水平的指数，是对居民退休准备程度的合理估计。在所赋权重中，“退休计划完善度”和“退休储蓄充分度”的权重明显高于其他问题，更偏向于衡量居民退休准备的实际行动。

